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人文学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扩展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奚爱国 冯 泉 常本春 余 珽
袁建华 高 健 孙 丽 郭东升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步健
副主任 陈 锋 朱 杰 夏 涛 钱照亮
魏晓蕾

编 委 (按笔画为序)

韦 敏 李 业 李 军 吴元庆
张吉林 张思东 陈 思 郭晓东
龚万达 潘庆磊

主 编 朱 杰

副主编 陈 思

目 录

2024年 第6期 总第152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吉 强
责任编辑:蒋建忠 王天海 徐晓婷 宋 好

统战理论与实践

- 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价值、有利条件与实践路径 / 陈云云 张 羽 4
- 新时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点、方式及影响因素分析 / 陈世柏 12

民营经济

- 民营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 郑琼洁 任兆柯 21
- 平台经济促进内需扩容提质的现实挑战与对策建议 / 江苏省工商联课题组 31

民族与宗教

- 理论认知、现实困境、实践反思、路径探索: 宗教中国化基层工作实践问题探析 / 赵晓锋 39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采编平台网址:<http://jsyb.cbpt.cnki.net/>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 年 12 月 18 日
定 价:8.00 元

中国式现代化

-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五个必由之路”的三维释读 / 朱 琳 47
- 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实现美好生活的优势探析 / 董伟伟 曹凤霞 56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内在关系 / 刘 巍 63

新视野

- 人文与经济的“离”与“合”：基于知识考古学的概念画像 / 何 雨 67

学习与思考

- 爱国企业家精神融入高校“大思政”的意蕴、现状与路径探索 / 陈晓峰 75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0 * 2024 - 06

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价值、有利条件与实践路径

陈云云 张 羽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国际舆论环境的新变化,以及促进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新要求,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战略目标,并积极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海外传播。海外侨胞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和重要外部力量,他们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和平性。我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海外侨胞的民族认同持续增强、华裔人才资源与数字媒体技术双重赋能,为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有利条件。新时代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项长期性、战略性系统工程,需要进一步明确传播主体,以侨胞精英为“关键少数”;丰富传播载体,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三宝”为重点;聚焦传播内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核;创新传播形式,以数媒技术为手段。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海外侨胞;中华文化;统战工作;民族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国际舆论环境的新变化以及促进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新要求,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战略目标,并积极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海外传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由于圈层隔阂、认知定势、语义流变等原因,文明传播容易陷入传而难通、传而不信的尴尬境地。海外

侨胞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和重要外部力量,其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生动诠释与积极践行。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海外侨胞总数已逾 6000 万,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群体优势。借助海外侨胞力量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一定程度

收稿日期:2024-10-20

作者简介:陈云云,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基地研究员,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江苏省侨联议政咨询专家,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张羽,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的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22BDJ080)、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研究”(22MLB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上能够转换视角、消弭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从实际效果看,海外侨胞既讲“中国话”又用“世界语”,有着天然的语言、跨文化等独特优势,能够以“中话外说”的形式,找到海外受众最能接受的切入点加以扩声、增量,从而提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海外传播成效。

一、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价值

(一) 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念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基本主张结合起来,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巩固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一方面,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连通历史与现实、国内与海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的文化场域。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指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1]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相辅相成,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海外侨胞在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既能深入了解“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新质生产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华现代文明理念,又能基于全球化、现代性视角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化了对中华文化的情感基础和认同基础,而文化认同又能直接转化为民族认同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2]。另一方面,海外少数民族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拓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海外视野和群众基础。海外少数民族侨胞是国内少数民族在海外的延伸,在文化属性上兼具“跨国性”和“中华根性”,他们是新时期爱国统一战

线的工作对象,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主体,这种双重身份能够产生叠加效应。海外少数民族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够激发其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最终实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与文明传播的互促共进。

(二) 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利于外来文明更好地“引进来”,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海外侨胞日常接触较多的是住在国文化,对于文化差异、文化冲突甚至文化休克具有切身感受^[3]。海外侨胞置身于多元文化、不同文明交融共生的世界,在文化和文明多样性中寻求共同的价值,并以自身的文化体验、文化融合反哺本民族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汲取外来文明中的有益因素,促进中外文明交流和互鉴。同时,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利于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出去”,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际影响力。西方社会对中国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见,对中华文明的不了解和误解是其原因之一。海外侨胞能够成为中外文明交流对话的桥梁,他们在海外通过举办文化节、艺术展览、节日庆典等活动,能够让当地民众直观地感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魅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逐渐改变中华民族形象、中国国家形象被“他塑”的不利局面。

(三) 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和平性

一是传播中华“和合”文化。“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合”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元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和平、和谐,重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协调一致的关系,强调包容万象的博爱精神,讲求“和合”的理念,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可。近年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强调的“和谐”“和美”“和气”“和平”等价值理念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得到进一步传播与弘扬。例如,“过春节”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有民族文化与

文化认同的象征意义，海外侨胞每逢春节举办舞龙舞狮、武术表演、花车表演、联欢晚会等节庆活动，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包容性与和谐之美。二是助力以“共商、共建、共享”为理念的“一带一路”建设。海外侨胞分布于“一带一路”沿线 60 多个国家与地区，他们凭借联通中外的优势，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地区的互联互通，促进和而不同、开放包容、亲仁善邻、立己达人、协和万邦、兼济天下等“利他”价值理念在“一带一路”沿线传播。三是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基础和精神纽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具体实践。海外侨胞向住在国民众展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和平底色，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世界和谐、全球公平公正作出文化层面的积极贡献。

二、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利条件

（一）我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与政策支持

广大侨胞能够在海外积极而自信地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关键因素在于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上升以及有力的政策支持。一方面，中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提升增强了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底气。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文明的影响力、传播力都是以自身实力为基础的，没有过硬的综合国力就不会有文化和文明的强势传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军事力量、科技创新力大幅度提升，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硬实力的可见性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海外侨胞的自豪感，也使得海外侨胞能够更加自信地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魅力和发展成果。与此同时，伴随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也得到极大增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士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产生浓厚兴趣，也更加

愿意接受中国的文化产品、文明成果和价值理念。海外侨胞在海外拥有更多的发声机会和话语权，为其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更多契机和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为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现实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切实有效且能够凝聚侨心、维护侨益的方针政策，较好地满足了海外侨胞对祖国的情感需求和利益诉求，这为他们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强大内驱力。近年来，为了充分满足海外侨胞的精神文化需求，使他们能在行动上积极支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海外传播，中国政府精心打造了“文化中国”系列品牌活动，并形成了由华文教育、华校教师培训、海外华校帮扶、华文教育国内支撑四个体系构成的海外华文教育工作新格局，鼓励、支持和引导海外侨胞积极参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海外传播^[4]。

（二）海外侨胞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

“落叶归根”的故土情怀和“落地生根”的他乡融入，将海外侨胞与祖国及住在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海外侨胞离开祖国生活，但依然传承着中华民族精神、民族品质、民族优良传统等，他们在接受异族文化的同时，有着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2014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指出：“在世界各地有几千万海外侨胞，大家都是中华大家庭的成员。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5]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其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发展时期，海外侨胞义无反顾地支持祖国和家乡的进步事业。近代以来，民族认同成为海外侨胞支持“洋务兴国”“实业救国”“科技强国”“文化立国”等一系

列自救自强运动的深层次动因。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族入侵的患难经历增强了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现代建设国家的共同经历又进一步强化了民族认同。可以说，海外侨胞支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播，正是民族认同的具体表现。同时，基于民族认同，海外侨胞在坚守中华文化方面也异常执着，这为其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坚实的文化认同基础。

（三）华裔人才资源与数字媒体技术双重赋能

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的“资源宝库”，他们借助自身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海外传播提供便利。例如，海外侨胞通过建立专业化的科技团体和网络社群，促进全球华裔人才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并通过技术应用和跨界融合，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播提供现代化的呈现方式。又如，海外华裔人才能够利用高新技术手段保护和传播中医、书法、绘画、武术、杂技、戏剧、建筑等中华文明优秀成果。同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效能，他们能够借助数字化、信息化的传播手段高效地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及其成果向世界传播。海外侨胞无论身处何地，既可以通过网络与祖国和家乡的亲友进行即时性沟通和信息分享，也能够根据住在国受众的特点和需求，借助社交媒体建立群组、网站、论坛等，精准化、差异化地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此外，世界范围内依旧具有文化交流、文明交融的发展态势，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依然密切，这也为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6]。

三、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路径

（一）明确传播主体：以侨胞精英为“关键少数”

客观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海外传播长期处于“以我为主”的单向传播阶段，虽能“走出去”，却存在“融不进去”的困境^[7]。相较于官方

主体，海外侨胞作为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间主体，具有非官方性、广泛性和群众性等特点，其从事的传播活动“更接地气”，更容易被住在国民众所接受，能够破解文明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差异”与“融通”难题。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处理好侨胞精英与普通侨众、“关键少数”与“绝大多数”的关系，不断拓展传播主体的参与阵容。

1. 发挥海外侨领的积极作用

一方面，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号召力的“大侨领”。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广泛团结海外侨众，多次发动募捐活动支持祖国抗战，他们在促进华侨团结、争取民族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缺乏具有全球性影响力、辐射力的“大侨领”，培育和打造“大侨领”较为迫切。另一方面，重视发挥网络华侨华人社团领袖的积极作用。海外新生代侨胞是名副其实的“网生一代”，网络是其了解中国、认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最主要渠道^[8]。近年来，海外侨情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以血缘、地缘、业缘等为基础建立的传统海外华侨华人社团逐渐式微，与之相联系的是网络华侨华人社团蓬勃发展，并逐渐渗透到海外侨胞的日常生活之中^[9]。鉴于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海外传播需要洞悉海外侨情的深刻变迁，与时俱进地做好网络时代海外华侨华人社团领袖的统战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时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海外传播不能忽视网络“大V”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网络“大V”已经突破了传统“大侨领→小侨领→普通侨胞→住在国民众”的差序传播格局。相对普通的海外侨胞一旦成为网络“大V”，其网络传播影响力可能远超“大侨领”，可以得到“以一当十”的传播效果。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海外传播需要发挥海外侨胞中网络“大V”的积极作用。

2. 做好华裔新生代的“留根”工程

华裔新生代综合素质较高、适应能力较强，

能够更好地借助新兴社交平台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优秀人才逐渐向“侨二代”“侨三代”甚至“侨N代”发展。相较于老一代人，华裔新生代自出生起就受到住在国主流价值观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不强烈，对自身的身份和归属认知具有一定的冲突性。因此，需要尽快唤醒和增强华裔新生代对祖国的故土情结，弥合感情断层。要切实关注他们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愿，增强其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基于“情感”与“实用”双重考量，海外华文教育在课程内容中可以适当增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容和元素，侧重讲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念与故事，帮助祖籍文化断层者逐渐增强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解和认同^[10]。在上述过程中，需要重视发挥华裔新生代青年领袖的头雁作用，使这一实践活动“后继有人”。

3. 培育高水平侨胞翻译人才

翻译是跨文化传播的前提条件之一。中华文明“走出去”的第一道门槛就是翻译。不少外国友人通过中国名著的译作了解到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海外侨胞对住在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价值理念等更为熟悉，在译介内容的选择、语言的表达上更容易符合海外受众的需求。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海外传播离不开高水平的侨胞翻译人才。一方面，借助多方力量建立一支较为熟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的侨胞翻译人才队伍。另一方面，提高侨胞翻译人才的技术水平和专业素养。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和工具日新月异，侨胞翻译人才需要不断提升翻译能力，熟练使用最新的翻译工具，以增强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功”。

需要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海外传播，既要强调传播主体的中心度，也要重视传播主体的数量优势，仅仅依靠侨胞精英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圈层化传播空间，普通侨众也能发挥积

极作用。因此，需要推动不同社会层级的侨胞群体，以其亲身经历和深刻感受讲好中华文化故事，更好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海外传播。

(二) 丰富传播载体：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三宝”为重点

华文教育、华文媒体、华人社团，被称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宝”，它们是中华文化传播的符号和名片，也是住在国民众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海外传播，不仅要靠个体或群体的努力，还需借助海外“三宝”力量，提升整体传播效果。

1. 以海外华文教育为平台

目前，全球共有 7.5 万多所中小学校、华文学校、培训机构开设了中文课程^[11]，致力于解决海外华文教育面临的“三化”（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和“三教”（教师、教材、教法）难题。教育是传承文明的载体，海外华文教育素有海外“希望工程”“留根工程”之称，从办学宗旨到培养目标，甚至是校名、校歌、校训，都非常重视对中华文明的介绍和实践，这对新时代讲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故事、构建中华文明叙事体系、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是需加大海外华文教育师资培养力度。目前海外华文教育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可推动海外华文学校与中国高校加强交流合作，开展高质量教师培训。二是海外华文教育在讲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故事的过程中，既要有鲜明的中国色彩，又要融入当地的文化元素，同时由大国叙事向鲜活、生动的个体故事转变，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故事的亲和力。三是海外华文学校需要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明交流活动。海外华文学校可通过开展“寻根之旅”、夏（冬）令营、文化周等活动，让华裔新生代亲身感受中华文明特质，增强其学习、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生动力，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从实际效果看，借助海外华文教育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助于唤醒华裔新生代的“祖籍记忆”，帮助他们逐渐突破归

属与身份认知障碍,实现“传播对象”到“传播主体”、“主族文化单向认同”到“主客两族文化并重”、“香蕉人”到“芒果人”的多重转变。

2. 以海外华文媒体为媒介

海外华文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各种网络新媒体,它们是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物质和技术载体,肩负着重要的文化使命。一方面,海外华文媒体可以将中华民族现代化文明用海外受众能够听得懂、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做到有故事、有细节、有数据、有情感、有温度,让受众身临其境,既入脑又入心^[12]。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海外华文媒体需抓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内核,同时依托新媒体、新技术,将生活中的日常事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故事有机融合,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向世界民众传播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声音^[13]。另一方面,促进海外华文传媒集团化发展,解决市场占有率低、过度内卷等问题。数家海外华文媒体“扎堆”集中在某个区域,虽能体现出多元化特色,但也易造成恶性竞争。因此,海外华文媒体在自愿的前提下,要从“单打独斗”走向“联合作战”,从“集中争食”走向“分而享食”,进一步整合资源、联合办媒,推动海外华文媒体不断融合并向集团化发展,从而增强海外华文媒体的传播实力。

3. 以海外华人社团为纽带

海外华人社团是移居海外的华侨和华人以一定的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它是侨胞联系乡亲、传递乡情的纽带,也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一方面,建强“领头雁”,打造“主心骨”,选好“排头兵”。努力提升海外华人社团的组织力和领导力,重点增强其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能力。另一方面,实现海外华人社团与侨校合作互通。海外华人社团在一定条件下能为侨校的创办和运行提供智力、经费等多方面支持,侨校反过来又能够进一步强化海外华人社团的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吸引更多的海外侨胞加入。因此,通过海外华人社团的力量能够不断壮大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海外传播的队伍。

此外,搭建数字文化平台是拓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播载体的一种新尝试。海外侨胞在使用目前已有的“中文联盟”数字化云服务学习平台的同时,可以打造专属的文明传播平台,供海外侨胞共享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海量资源。

(三) 聚焦传播内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核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文化软实力,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和底色^[14]。海外侨胞对中华文化具有广泛的认同,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海外传播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核,把握传统智慧与现代价值的结合点,找到与侨胞对话交流的“最大公约数”。

1. 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产业相融合

一是推进海外中华文化产业化发展。海外中华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树立精品意识,因地制宜打造过硬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品牌,推出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中华文化精髓、中华文明优势的精品力作^[15]。二是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新的文化产品。当前,外国民众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式较为单一,除了通过虚拟网络世界、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和使领馆举办的节庆活动外,在其日常生活中缺乏真实、立体、直观了解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途径。近年来,由侨胞公益组织精心打造的海外中华传统文化体验中心等,是一种能够让国外民众直接认识、零距离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功探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推广。

2. 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管理理念等现代文明元素结合,是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海外传播的重要方式。以中餐业为例,需要实现传统饮食文化与现代餐饮业的结合。中餐业是外国民众接触中华文化难度最低的“媒介”。遍布世界的几十万家中餐馆共同演绎了“舌尖上的中国”,它们是几十万个打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流量

的窗口。当住在国民众经由海外侨胞推介走进中餐厅,这种流量就产生了呼朋引伴的裂变效应、日积月累的乘数效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就找到从“入口”到“入心”的传播路径。餐饮业是海外侨胞从事的重要行业,欲解决当下海外餐饮业面临的劳工、技术、管理人员短缺等问题,就必须结合现代餐饮业的特征,与时俱进融入新元素,吸收西餐文化中的流程化、标准化生产的运营模式^[16],并提高质量和档次,打破国外民众对中餐廉价、低档的刻板印象。

3. 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生活世界相适应

其一,海外侨胞需要遴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能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容进行精准传播。海外侨胞可以重点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主张和平、仁爱、和谐的儒家思想和强调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家观念等与住在国民众的生活世界相融合。这既能彰显中华文化特殊性中所蕴含的普遍性,突出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共通性,又能以“同”求发展,贴近外国民众的生活世界,便于其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二,海外侨胞需要有针对性地选取与受众实际需求相适应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汉服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服饰文化、以中华美食为代表的中华传统饮食文化、以天算农医为代表的中华传统科技文化、以春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等,不仅蕴含了中国人民美美与共、求新求变、艰苦奋斗等精神信仰、人生态度和对生活细节的关注,而且也能与住在国民众的生活世界建立联系^[17]。

此外,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注意传播内容的特殊性和意识形态的敏感性。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部分西方媒体的长期误导,海外社会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传播可能持怀疑态度,传播行为容易被解读为一种文化洗脑、文化入侵。因此,海外侨胞在选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播内容时,需要尽量避免敏感内容与话题,以免被打上“政治化”标签。可以重点向海外介绍中国的科技发展、文学艺术、教育制度、社会

进步等不易引起争议的内容,并充分考虑住在国的法律制度、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尊重文明差异,避免软实力硬包装。

(四) 创新传播形式:以数媒技术为手段

数媒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沟通、文化交流、文明传播等实践活动逐渐摆脱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诸多便利和契机。

1. 创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播途径

数媒时代,除了传统的文字表达、图画展示、声音传输、影像传播外,“5G+人工智能+VR/AR”的传播模式正在不断延伸着人们的视觉和听觉感知,能够以更为丰富的传播形式助力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8]。海外侨胞可以借助VR技术实现中国历史文化场景的再现,让海外民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2018年,加拿大温哥华一家数字媒体中心学校的6名硕士研究生,与当地“华埠故事馆”合作,制作出一款名为“被隐藏的故事”的APP,其充分利用VR技术彰显了温哥华华埠对中华文明的坚守与弘扬。因此,海外侨胞可以尝试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虚拟人物讲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成就和故事。同时,打造富含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游戏IP也是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快速“出海”的有效途径。例如,最近爆火的《黑神话:悟空》承载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内涵,让不了解《西游记》和中华神话故事的海外玩家更加主动地认识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也让更多的海外侨胞自觉地成为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者。

2. 借助新型社交媒体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新型社交媒体是数字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逐渐成为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渠道。海外侨胞通过建立个人和团体账号,利用脸书、TikTok等新型社交媒体向外国民众推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关内容。社交媒体短视频不同于传统媒体,其具有鲜明的即时性、互动性等特

点,海外侨胞可以借助新型社交媒体更加快捷地搭建跨国文化交流网络,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高效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鼓励“洋网红”进行跨文化传播,“洋网红”作为感受和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客观“第三方”,可利用其国别特性、差异文化背景,帮助所在国民众重新认知或再次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总之,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行走的名片”,他们既具有中华文化根基,又熟悉住在国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因此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海外传播中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发挥特殊作用。展望未来,海外侨胞在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仍需树立问题意识,既要认识到自身在文化和身份认同上可能存在的认知障碍、受到的多元文化影响等多方面挑战,也要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海外传播的战略性和长期性和艰巨性。

参考文献:

- [1][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63、63.
- [2] 郎晓军. 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新时代海外文化统战工作[J].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3): 40.
- [3] 曾毅平. 华文教育的时代价值: 诉求平衡与功能拓展[J]. 华侨华人学研究, 2023(1): 41.
- [4] 张秀明. 新视野下的海外侨胞[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23: 43.
- [6] 徐国亮, 薛伟. 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中华优秀传

- 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四重维度[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4(3): 42.
- [7] 曹霞. 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身份构建与功能角色[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3): 151.
- [8] 祝阳. 新生代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分析[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5): 62.
- [9] 刘琛, 王丹丹, 宋泽宁, 等. 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71.
- [10] 米芳兰. 促进海外华裔新生代中华文化认同的路径研究[J]. 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4): 30.
- [11] 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2624号(教育类091号)提案答复的函[EB/OL]. (2021-10-15).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yuhe/202111/t20211104_577702.html.
- [12] 何亚非. 发挥华侨传播中华文化优势[J]. 对外传播, 2015(7): 7.
- [13] 中央统战部培训中心. 海外侨胞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承和传播研究[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23: 15.
- [14] 项久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根源、价值根柢与实践根基[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6): 2.
- [15] 张春旺, 张秀明. 世界侨情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37.
- [16] 刘悦. 跨文化记忆与身份建构——欧洲华裔新生代的文化认同[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20: 215-216.
- [17] 林伯海, 李潘. 以统一战线为载体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23(6): 49.
- [18] 王莹. 立足海外, 根植中华: 融媒体时代“中国故事”海外传播之路[J]. 华侨华人学研究, 2023(1): 109.

责任编辑: 吉强

新时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点、方式及影响因素分析

陈世柏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和关键。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重要成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新时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呈现出认同主体的广泛性和差异性,认同模式的去中心化、流动性和多样性,主体认同的主观能动性增强等特点。在认同方式上,是以民族文化认同为核心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原生性认同与建构性认同兼而有之。国际体系、国家政府和族群社会、海外侨胞家庭以及自身的生活和移民经历是其认同建构的重要载体,也是影响制约其认同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归属感认同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面对外部势力的干扰和国际斗争日趋尖锐的严峻挑战,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必须以全球治理视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中华民族大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和关

键,目前学术界在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时,往往将研究焦点集中在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上,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和民族地区群体,而对于海外侨胞的研究相对较少。这种研究倾向可能限制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全面理解,从而影响到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力量的广泛性和深度。

海外侨胞是指移居在我国大陆和港澳台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胞,包括海外华侨和海外华人,其中海外华侨是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海外华人是定居国外并加入住在国国籍的具有中国血统的华人及其后裔。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的重

收稿日期:2024-08-30

作者简介:陈世柏,广东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海外侨胞的集体记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1BKS14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要组成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属于其主体身份认同，目前学术界对海外侨胞的主体身份认同主要从住在国视角、跨国主义视角和全球视角展开研究，从祖（籍）国—中国视角对其身份认同建构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将海外侨胞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祖（籍）国—中国为视角，研究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这不仅在理论上能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视域，丰富相关理论；在实践中也有利于进一步团结海内外中国同胞，汇聚起全体中华民族成员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此外，还有助于海外侨胞更好地弘扬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一、新时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点

新时代，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海外侨胞与中国的联系不断加强，互动更为频繁，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一）认同主体的广泛性和差异性

根据海外侨胞的移民和生活经历，可以分为老移民、新移民及其后代。在新时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体具有广泛性，涵盖了老移民、新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同时，不同群体的认同存在差异性。

老移民主要是以劳工形式移民海外，其中许多人是契约华工的身份出国。到海外后他们遭到当地统治者的无情压迫和剥削，又面临着侨居地的种族歧视。为此，祖国的强大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为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晚清以后，他们开始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联系起来，从爱“家”的狭隘观念上升到关心祖国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民族国家观念，从而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二战后，虽然有许多华侨加入住在国国籍，但仍有一部分保留着华侨身份。作为中国公民，他们

对中国感情深厚，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种族和文化上认同中华民族，并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虽然大部分华侨成为住在国的公民，在政治和法律上接受住在国的政治、法律的规定，但他们仍然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并在五缘文化上与祖（籍）国保持着紧密联系。这种文化根性使得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保护者。

新移民是改革开放后移民到海外的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新生力量。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新移民在中国接受的教育是他们产生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因素。新移民长期在中国接受教育，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留学生转变身份而来，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老移民要高，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作出的贡献大，愿意以各种形式参与祖（籍）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新移民与中国密切的联系是他们产生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情感基础。新移民大多生长在中国，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与老移民相比，新移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更多受到中国崛起的影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动力主要是民族主义情感和利益需求，通过群体认同来获得个体尊严和利益，进而维护中国的尊严和利益，实现与中国的荣辱与共。

华裔是指出生和生活在住在国并已取得住在国国籍的中国人的后代。他们大多接受的是住在国的文化教育、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有些华裔既不会讲也听不懂中文，缺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对祖（籍）国和祖（籍）地感情较淡薄，面临着文化认同挑战。然而，华裔毕竟与中国之间存在着血缘和亲缘关系，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识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受到父辈的教育影响。在父辈的引导下，他们到中国寻根、探亲、留学、旅游、参加中华

文化夏令营等中外文化交流活动,通过这些社会化的教育、学习和实践,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深化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识,从而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从潜在变为现实,从自发走向自觉,从个体走向群体。“虽然现在有很多华裔新生代从外国出生、长大,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是认可中华民族的身份,也愿意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2]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推进,华裔的中国情结被进一步激发,他们更加关注中国的发展动态。这种情结促使他们逐渐接受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加深了他们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使他们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分子。因此,华裔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和实现中国梦的潜在力量。

(二) 认同模式的去中心化、流动性和多样性

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模式随着时间而变化。从晚清到二战前,海外华侨只是把移民作为谋生的手段,到了晚年往往会落叶归根。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呈现出一种以中国为中心,以海外住在地为边缘的格局,互动主要表现为从海外向中国单向的情感和物质流动。因此,海外华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是在“家国同一”的框架内,他们心向祖国,在政治上积极参与和支持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如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更多是通过直接参与的模式实现。

二战后,由于大多数华侨加入了住在国国籍,成为住在国公民,与中国的关系是以祖(籍)国—住在国为轴心,互动表现为双向的、从中心到中心的双向交流模式。他们不仅积极融入住在国社会,促进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提升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还往返于祖(籍)国和住在国之间,通过资金、技术转移、信息交流、观念更新、管理经验分享等方式等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他们成为促进祖(籍)国和住在国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是两地民间外交的使者。

步入新时代,海外侨胞与中国的互动呈现去中心化、流动性和多样性特征。以技术移民为代表的跨国侨胞游走于“家”“国”甚至第三国之间,凭借华商网络与祖(籍)国建立起稳定的联系,推动着人员、观念、技术、商品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和交流。他们在跨国空间与祖(籍)国建立联系,在实践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例如,在世界各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作为民间外交的使者,推动中外科技经贸合作,助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在国际上极力维护中国国家形象,维护和促进中国统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此外,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具有多样性,包括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线上认同和以传统媒体为媒介的线下认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空间得以扩展,海外侨胞通过邮件、视频、博客、微博、微信、QQ等互联网的线上方式关注祖(籍)国的发展。“电子网络社区的存在,使得海外华侨华人在其中尽情畅游,尽情交流,倾吐思乡爱国之情,交流异国生活心得,讨论祖(籍)国发展大计,探讨国际风云变幻。这些网络社区,不受时间限制,突破了空间的障碍,紧紧地维系着海外华侨华人的中国心。”^[3]

(三) 主体认同的主观能动性增强

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具有主观能动性,是基于中华民族成员的情感和价值意义,主动选择和建构的身份认同。海外侨胞之所以主动选择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因为作为中华民族群体成员的身份激发了他们与中华民族相关的情感和价值认同。“新时代10年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极大激发了海外侨胞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爱国友好力量更加巩固。”^[4]

新时代中国的发展为海外侨胞带来了新机遇和更大的利益,增强了他们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观能动性。追求利益是人的本能,利益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是个体认同的驱动

器。“‘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海外侨胞获得的新机遇和利益主要表现在：一是依靠中国“市场禀赋”优势，获得了扩大出口的机遇。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互联互通”，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海外侨胞带来扩大出口、合作共赢的新机遇。二是利用中国“能源资源禀赋”价值，获取了更多的商机。当前中国正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海外侨胞可以从中挖掘中国“能源资源禀赋”价值，捕捉更多商机。三是利用中国“科技禀赋”优势获得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机遇。新时代，中国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从而使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成为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科技创新发展为海外侨胞提供了提升自身现代化的历史契机，“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为代表的新经济领域发展迅速，这也为海外华商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机遇”^[6]。

新时代中国实施的侨务政策增强了海外侨胞认同的主观能动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题。为了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2016年，中国政府印发了《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2016—2020年）》，不断加强侨务法治建设，维护海外侨胞利益；2018年，调整了侨务机构设置，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整体并入中央统战部，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领导；同年设立移民管理局，吸引高技术华人人才回国服务；继续推进“绿卡”、居留、签证以及出入境制度等试点改革，建立“侨梦苑”

侨商产业聚集区和海外侨胞创新创业基地，健全为侨公共服务体系等等。中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侨务政策增强了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利于强化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身份，建构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个体以共同身份重新定义群体边界的时候，原本的内群体和外群体的边界就会变得模糊，而认同包容性更强的群体则效能感会强化，凝聚力会提升。”^[7]

二、新时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方式

新时代，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在方式上是以民族文化认同为核心，体现了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在层次上，原生性认同与建构性认同兼而有之，但建构性认同日益成为主流趋势。

（一）认同方式：以民族文化认同为核心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8]可见，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核心内容，具体表现为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和对伟大祖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等三个维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特点。对于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不仅是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认同，也是作为中国国家公民对国族共有身份的认同。中山大学肖滨教授把公民身份划分为政治—法律公民身份和文化—心理公民身份，前者与赞同性认同对应，后者与归属感认同对应。作为中国公民，56个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是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文化—心理公民身份的统一，在

认同方式上是赞同性认同与归属感认同的统一，体现了普遍性。

对于海外侨胞来说，他们是定居住在国的公民/国民，其中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具有特殊性，在认同方式上是对祖（籍）国的归属感认同。“对于移居他国的公民来说，他可以分离两种国家认同：对母国持归属感国家认同，对移居国——如果他赞同该国的制度安排——则持赞同性国家认同，这样，他只需要认可、接受移居国的政治文化，而无须放弃他祖先的文化生活形式。”^[9]

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殊性体现在：基于文化—心理公民/国民身份对中华民族产生的是归属感认同。文化—心理公民/国民身份“主要处理公民与国家/民族共同体（nation）的关系，关注‘作为公民，我是谁’或者‘我属于谁’的问题”^[10]。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正是海外侨胞对自己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思考。文化—心理公民/国民身份的要义并不是公民/国民的权利和义务，而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归属感’，一种‘在家’的感觉”^[11]。归属感是个体对自己属于某社会群体而在心理上产生的一种感知和体验，体现了个体与社会群体的情感联系。个体的归属感与其社会认同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个体的归属感能提升个体在社会群体中的幸福感、满足感和认同感，有助于个体更好地融入群体之中，与群体成员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群体团结；并且能使个体积极参与群体活动，进而产生集体认同和合作行为。另一方面，社会认同是个体形成归属感的基础。当个体认同某社会群体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时，就会对其产生归属感，并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可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海外侨胞作为文化—心理公民/国民身份对文化和心理归属感的需求。因此，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看，要建构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应该从文化—心理公民/国民身份入手，以建构其中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为前提，

使其明确“我是谁”或者“我属于谁”的问题，从而产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归属、心理依恋和情感寄托。

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在内容上主要是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成员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承认和认可，“它的核心意义在于对民族群体以及民族群体精神的需要”^[12]。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民族文化认同能够满足海外侨胞群体的精神需要，他们往往把家乡的神祇带往住在国供奉，在住在国创建华侨华人社团，兴办华文教育，创办华文报刊，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举办舞狮、舞龙、唱戏、猜灯谜等中国传统文化活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已入外籍的华人来说，他们在政治上认同住在国，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超越了政治，是民族文化认同。“已入外籍的华人，对其居留国只是国籍认同、政治认同，‘华人’的民族属性不变。他们与中华民族则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13]对于华侨而言，他们是中国公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也是中国国家公民对国族共有身份的认同。因此，除了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认同外，他们还对中华民族的国家、历史和祖国同胞等寻求归属感认同，对伟大祖国、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也是其归属感认同的对象和目标。新时代，建构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要以中华文化为纽带，以民族文化认同为核心，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将海外侨胞纳入“文化中国”。对于海外华侨，在推进其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培养和建构其对伟大祖国、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二）认同层次：原生性认同与建构性认同兼而有之

早期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最初是从家族认同（血缘认同）、家乡认同（地缘认同）等原生性情感认同开始的，往往强调共同的民族起源、共同的民族文化、共同的血缘地域关系以

及共同的经济生活。从认同的属性来看,血缘认同和地缘认同是先赋性群体认同,族群认同是获得性组织认同。早期海外侨胞分群的基础主要是语言和出生地,因此,早期海外侨胞往往以语缘和地缘为基础,形成方言群的身份认同意识,而方言认同则成为血缘认同和地缘认同的重要表现形式。由于各方言群体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晚清以前海外侨胞并没有形成国家和民族意识,即他们的认同并没上升到对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晚清以后,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才产生建构性认同。建构性认同是人们在国家、政党、经济社会结构或特定的社会群体的影响下,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自身利益需要做出的理性选择。随着经济全球化,海外侨胞分群的基础主要是教育背景、种族意识、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海外侨胞由早期的血缘认同和地缘认同向华人群体社会、经济、政治利益认同转变,继而向对中国的国家认同转变,华侨民族主义逐渐形成,“华侨对中国命运的强烈关切是华侨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4]。华侨民族意识的觉醒促使他们持续关切中国命运,维护中华民族尊严,保护侨胞共同利益,团结、合作成为主旋律。因此,这时期的语言认同实际上为海外侨胞身份认同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则成为海外侨胞身份认同的核心,促使他们参加和支持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中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护海外侨胞权益,吸引他们回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大批海外侨胞回到家乡,通过投资和捐赠等方式支持家乡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海外侨胞的重要作用,将海外侨胞视为改革开放的独特机遇,重视并利用他们的海外关系作为加强中外联系的纽带和通道。海外侨胞积极响应回国参与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拓荒者。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

同主要体现在对家族、家乡和族群等内群体的认同,他们大多数把资金投向祖籍地,希望通过改善家乡的发展来促进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时期,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的原生性认同和建构性认同兼而有之,但原生性认同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侨务政策对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建构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海外侨胞在对家族、家乡和族群等原生性情感认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和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国家及其祖(籍)国同胞的认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海外侨胞的投资、捐赠等活动逐渐突破地域界限,跨祖籍地投资和捐赠的现象变得较为普遍。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性认同是建立在社会互动基础上的。新时代海外侨胞与中国的联系更为紧密、互动更加频繁,中国已成为海外侨胞联系的主要对象,这与新时代中华民族面临的新形势紧密相关。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命运紧密相连。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帮助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现代化国家,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正如学者黄兴涛所言,“‘中华民族的现代性’绝不仅仅表现在反抗外来压迫、实现全民族的独立,建设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现代化民族国家,才是其更为根本的目标”^[5],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国家及其祖(籍)国同胞的认同促使他们产生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情感,进而做出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

三、新时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影响因素

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限制,具有受制约性。“民族认同是微观认知与宏观结构互动的产物,其产生是一种社会过程而非简单地由族群文化或其他

固定标准界定的。”^[16] 国际体系、国家政府和族群社会、海外侨胞的家庭以及其自身的生活和移民经历是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构的重要载体，也是影响其认同的重要因素。

（一）国际体系与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

认同是个体的心理过程，个体的认同受到内部因素的推动，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化对个体认同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国际体系结构的多极化发展为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促进了国际体系结构的多极化，为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国际局势的变化也给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带来严峻挑战。当前，国际政治纷争不断，军事冲突多点爆发，全球发展和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横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成为国际秩序以及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大国关系面临新的调整，不确定性增强，互动中的复杂博弈加剧，中国民族问题正面临外部势力的干扰和国际斗争的挑战。

（二）中国的发展及其与海外侨胞住在国的关系的影响

新时代，中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长期稳定，改革持续推进，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增强了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增强了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不断发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方案，这增强了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在新时代，中国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海外侨胞住在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改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然而，

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刻意歪曲事实，频繁散布“中国威胁论”，公开挑拨中国与海外侨胞住在国关系，致使有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过度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些国家的对华关系和移民政策，从而对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产生影响。

（三）海外侨胞在住在国所处的多元文化环境的影响

海外侨胞移民到海外，面临着多元文化的挑战。住在国的多元文化环境推动了华侨华人社区的转变。一方面，促使海外侨胞改变了传统的叶落归根的观念，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主动与当地其他族群和主流社会交往，为当地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另一方面，给海外侨胞民族文化认同带来了挑战。海外侨胞在住在国通常具有两种身份，既是住在国的公民身份，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多元文化环境为海外侨胞提供更为开放和包容的生活空间，但也可能导致他们难以在众多文化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和方向。”^[17] 因此，海外侨胞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如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下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

（四）海外侨胞家庭的文化鸿沟和代际冲突及其自身经历的影响

认同是个体对他人或群体的承认和接纳，是个体与认同对象在感情和心理上趋同的过程。作为一种心理活动，认同与个体的家庭文化环境、生活经历、语言以及接受的文化教育紧密相关。一方面，海外侨胞的家庭内部的文化鸿沟与代际冲突是影响其认同的重要因素。许多移民父母接受的是中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而其子女则接受的是住在国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这种跨文化冲突加深了代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海外侨胞的后代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知，进而影响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另一方面，个体的生活经历、语言能力及其中文水平影响其认同。海外侨胞如果从小在中国生活，接受

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与中国的感情就会更深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可能性更大。而出生在住在国的第二代以后的海外侨胞大多加入了住在国国籍，接受住在国的文化教育，因而面临着复杂的文化认同危机。“对那些新的，带有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移民共同体来说，即使他们已经被接纳为国家的成员，也依然要花费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使其后代被接纳进当地‘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范围。”^[18]“对那些能读、写汉语的华人而言，这种汉语的读、写能力是华人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持续的关键因素。”^[19]能读、能写汉语的侨胞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中华文化，从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更强。没有接受中文教育的侨胞可能会因语言障碍限制与中国人的交流，从而影响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认同。

四、结语

新时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呈现出新特点和新方式。首先，这与海外侨胞自身的教育水平、与中国的联系紧密相关。他们的汉语读写能力越强，就越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从而更有可能产生中华民族情感、集体记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同时，海外侨胞到中国的寻根祭祖、研学、旅游、交流、投资、捐赠等实践活动是他们产生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催化剂，与中国的联系越密切，互动越频繁，对中国的感情就越深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也就越强烈。其次，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实力的历史性跃升，极大地激发了海外侨胞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促进了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最后，当前的国际形势也对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有着重要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为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复杂的国际局势也使中国的民族问题面临挑战，使得新时代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呈现出复杂性特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9.
- [2] 裘援平. 海外华裔新生代逐渐认同中华民族身份[EB/OL].(2018-03-09).https://www.sohu.com/a/225205950_255783.
- [3] 聂传清. “三新”: 新移民带来的新变化[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2-02-13(6).
- [4] 陈旭.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情况的报告——2023年4月24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二次会议上[EB/OL].(2023-04-26). 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304/t20230426_429042.html.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86.
- [6] 邢菁华. 浅析“五通”“五缘”与华商网络[J]. 侨务工作研究, 2022(6): 46.
- [7] 管健, 荣杨. 共同内群体认同: 建构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认同[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 44.
- [8]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1-08-29(1).
- [9][10] 肖滨. 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1): 81-82, 79.
- [11] 特纳. 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M]. 郭忠华, 蒋红军,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 145.
- [12] 詹小美, 王仕民. 论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与条件[J]. 哲学研究, 2011(12): 118.
- [13] 史式. 中华民族史研究: 第一辑[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40.
- [14] 陈丽娟. 华侨·华人·中国民族主义[J]. 读书. 2004(5): 15.
- [15] 黄兴涛. 现代中华民族认同史小议[N]. 北京日报. 2010-04-19(18).
- [16] Eberhardt, J.L. Imaging Race[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5(2): 181-190.

[17] 陈慧萍. 海外侨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研究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3(6): 96.

[18] 史密斯. 民族认同 [M]. 王娟,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17-18.

[19] 陈志明. 华裔族群: 语言、国籍与认同 [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4): 32.

责任编辑: 于博洋

民营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郑琼洁 任兆柯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代表新技术、创造新价值、适应新产业、重塑新动能的先进生产力。民营经济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灵活机制和创新能力,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研究从技术创新、生产要素创新配置、产业体系转型三个视角阐释了民营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了民营经济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中面临着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不牢、推动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差距、民营经济深度转型升级存短板等问题,提出民营经济可以通过以下措施进一步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是以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平台、高素质人才协同体系助力创新能力自主化;二是以激发活力、集群发展优化创新性要素配置效率;三是以巩固实体经济、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助推产业结构深度升级。

关键词:民营经济;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内在逻辑;实现路径

一、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体现了新技术的运用、新价值的创造、新产业的适应以及新动能的重塑,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关键所在。

民营经济以其对市场的敏锐洞察、灵活的运营机制和持续的创新能力强等优势,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新质生产力强调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目前学者基于上述三个方面围绕民营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作了一些探索和研究。

收稿日期:2024-10-19

作者简介:郑琼洁,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苏省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副理事长,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任兆柯,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江苏现代财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智赋能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与路径研究”(23BGL054)、江苏省“333工程”人才项目“数字经济推动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影响机理与路径研究”、江苏省重点智库2024年度课题“江苏省制造业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困境与路径研究”、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组织权变——协同治理视角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机制与路径研究”(2021SJA027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技术革命性突破方面,民营经济具有灵活的机制和高效的管理,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专精特新企业作为现代化产业的微观载体,通过颠覆性技术突破、跨界颠覆等抢占科技制高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一是科技创新可以为民营企业增添动能,优化企业生产流程,降低人力成本,提高民营企业生产效率;二是借助数字化技术转型升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从多维度促进企业内在革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动力^[2];三是企业通过紧密关注市场需求,以激发内部技术创新的方式实现传统制造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制造的转变,从而培育出新质生产力^[3]。

在生产要素创新配置研究方面,已有文献分别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三个组成要素展开研究。劳动者高素质化、劳动工具数字化升级、劳动对象绿色化对新质生产力提升具有显著影响^[4]。“新质”劳动者是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最活跃的核心要素,生产力在向绿色化、数字化、融合化转型的进程中,“新质”高素质企业劳动者会成为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加速器”^[5]。“新质”劳动资料是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与新型劳动工具同步数字化转型,尤其通过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和信息平台、电子设备、计算机等软硬件促进劳动工具和企业的数字化特质日益明显,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助推器^[6]。企业将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传统生产工具结合,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改变传统劳动方式,为新质生产力构建良好发展环境^[7]。“新质”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新型劳动对象具有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的特质,民营企业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持续性的创新能力生产制造出时代发展需求的“新质”产品,不断为新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8]。以产业数字化推动生产信息数据化,以数字产业化推进生活、生态和社会

运行信息的数据化,坚定地以数字化驱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进而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9]。

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方面,民营经济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质生产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发展新质生产力依赖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基础^[10],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更多掌握新技术的新产业承载。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一方面是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传统制造业、服务业转型升级为着力点,将产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只有促成科技成果以产业化形式落地才能真正成为“新质”生产力^[11]。以实施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方式,支持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引导龙头企业与民营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嵌入式发展,培育壮大民营经济发展机制,推动民营经济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12]。“智改数转网联”作为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深入贯彻“智改数转网联”行动推进传统制造业“数字换脑”是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路径^[13]。另一方面是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由于新兴产业与新质生产力形成在技术来源、要素组合和产业基础存在高度一致性,因此科技创新密集的新兴产业适合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新兴产业通过关键要素聚集、基础设施承载、经济组织变革等路径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14]。未来产业是以新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兴产业具体表现形式,通过提升产业基础研究能力、强化创新主导地位 and 贯彻因地制宜发展思路,对新质生产力的要素质量提升和资源效率改善具有重要意义^[15]。

综上,现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启示,但是民营企业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仍需进一步深化:一是关于民营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从新质生产力三要素视角出发的研

究；二是基于中国国情的民营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研究比较缺乏，特别是系统审视当前民营经济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中面临的主要挑战、问题及其发展路径等主题。因此，本研究旨在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视角，重点探讨民营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存在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发展路径。

二、民营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

新质生产力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其核心在于创新。民营经济通过不断强化自身的创新能力，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深化产业升级，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民营经济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民营经济通过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建设创新平台和培育高素质人才三个层面提升创新能力，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第一，民营企业通过鼓励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第二，民营企业通过建立和完善创新创业孵化器、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园区等创新平台来培育新质生产力。创新平台可以为民营企业提供场地、设备、资金等支持，促进创新合作和技术转移。同时，民营企业可与高校、研究机构等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共享科研资源和人才，加强技术交流合作，提升创新能力。第三，民营企业通过强化人才培育与引进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完善的人才引进、培育、激励机制，吸引高层次及专业人才加入民营企业，从而为民营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增强其创新力和市场竞争力。上述三个层面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自主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二）民营经济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通过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都

需要创造性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在这一过程中，民营企业通过发挥企业家精神，对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进行创新性开发和配置，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首先，民营经济通过培育和激励新质劳动者，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人才选拔、使用以及薪酬激励方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这种优势使得民营企业更容易吸引和激发那些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新型劳动者。其次，民营经济通过使用新质劳动资料，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民营企业组织扁平化程度更高，管理机制更加灵活，更易于尝试和开发新技术，更善于将新技术和传统生产工具结合，提高生产效率。最后，民营经济通过开发新质劳动对象，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锻造出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持续的创新能力。这种环境促使民营企业更有动力和能力去开发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进而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三）民营经济通过深化产业升级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民营经济通过关注传统产业的迭代更新与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级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向深度升级，共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一方面，民营经济通过促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民营企业通过引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自动化设备，企业能够实现生产过程的精准控制和优化管理。与此同时，民营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这一过程不仅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还有效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此外，民营企业通过推进绿色制造和可持续发展，促进传统产业向绿色环保方向转型，可以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生产。

另一方面，民营经济通过发展新兴产业，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通过集中精力和资源，大力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积极拓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能够促使劳动对象逐步转变为更加现代化和先进的形态。这种转变不仅有助于扩大和延伸产业发展的空间，还能够进一步培育和壮大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新质生产力。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能够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三、民营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探索

民营经济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实践探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重要课题。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民营经济积极探索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重要力量。

（一）民营经济为新质生产力中新技术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民营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决定其在创新创业、技术攻关、研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已经成为主力军。

一是民营企业已成为创新创业和技术攻关的主体力量。民营企业作为创业投资的主体，投资增速持续加快，在当前阶段，技术密集产业的投资正经历快速增长，新的增长点和竞争优势正在持续地被培养和加强。2024 年前 7 个月，技术密集产业的投资同比增长率达到了 10.60%，明显超过了整体投资增长率 6.8 个百分点^[16]。航空和航天设备制造业以及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长幅度分别高达 38.30% 和 12.10%。与此同时，在技术密集型服务业领域，电子商务服务业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的投资增长幅度也分别达到了 24.10% 和 17.40%^[17]。2024 年全国民间投资重点产业项目清单也更加聚焦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

二是民营企业成为创新研发的主体，研发强度不断提升。截至 2023 年，中国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5.14%，与美国、欧盟、日本企业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全国工商联报告显示，研发投入排名前 1000 位的民营企业研发费用占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 40.14%，占全国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的 51.75%。1000 家民营企业中通过自主开发与研制掌握关键技术的有 897 家，民营企业自主研发强度和研发能力不断加强。民营企业凭借占比超 80.00% 的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 90.00% 的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2500 万户“四新经济”民营企业以及开放的引才聚才机制，吸纳了大量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引进了大量科技型外资机构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三是民营经济成为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领域。民营经济更加注重新技术的转化价值，通过引入大量“耐心资本”，推动更多颠覆性科学技术、前沿性科研成果从“知产”变为“资产”，构建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良性循环。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技术合同登记总量约 95 万项，同比增长 22.45%，成果转化成交额达到约 6100 亿元，同比增长 28.63%。聚焦于信息技术革新、先进设备、绿色能源汽车、医疗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的民企，正在与科研院所紧密合作，共同推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革新，实现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的深度融合。在这一过程中，诸如小米、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迅速崛起，极大地提高了科研成果的商业化效率。民营经济更加注重技术的应用价值，相较于开展基础研究，民营经济主体对细分市场需求及技术应用场景更为敏感，能有效解决高校、研究所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激励有限的问题，加速实现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不断释放经济利益。

（二）民营经济为新质生产力中新产业的形成提供重要支撑

催生新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表现形

式之一，民营经济在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中功不可没。

一是民营经济更能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民营经济主体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稳步提升。截至2023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共37万家，其中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超过35万家，占比高达94.00%。截至2024年7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70%，增速比全部制造业投资高0.4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1.9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2个百分点，比全部服务业投资高12.6个百分点。其中，专业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5.40%，电子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17.90%，研发与设计服务业投资增长16.60%，民营经济在高技术企业发展中起到带头引领作用。截至2023年底，我国成功培育了21.5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和9.8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其中1.2万家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民营企业占了95.00%左右的比例。另外，还有70.00%左右的技术创新和85.00%以上的新产品都来自民营企业。

二是民营经济更能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发展。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获取未来竞争优势的关键，民营经济已逐渐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先导力量。《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数据显示，从事航天技术、类脑智能等未来产业的企业数量从2019年底的14万余家上升到2024年5月底的36万余家，其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96.00%。

（三）民营经济为新质生产力中新模式的实践提供重要市场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要素及其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民营经济在提升和提质劳动要素的组合优化中前景广阔。

一是“智改数转网联”助力民营经济效率变

革。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进一步优化了民营经济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与合理流动，通过优化生产流程、改善组织方式、合理控制成本等，全面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满足新时代新要求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模式。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培育421家国家级示范工厂、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52个国家“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3000余个“5G工厂”，并认定中兴通讯南京智能滨江工厂为首个五星5G工厂，国家级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约340个。

二是“绿色低碳”推进民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传统民营经济粗放型发展方式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不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民营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必然要求其产品和服务更为绿色、健康、节能、环保。从实践情况看，民营经济绿色发展存在着显著共性特征，如在研发环节上，致力于打造超国家标准的“绿色新标”；在制造环节中，更注重清洁生产、污染控制和节能减排，打造“绿色工厂”；在推广宣传上，联合上下游供应商、客户协同转型升级，积极引导选择绿色营销和消费，构建“绿色生态”。民营经济把绿色发展作为质量提升的新方向，使绿色低碳成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特征与新优势。

四、民营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民营经济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瓶颈，如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依旧不牢、推动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差距、民营经济深度转型升级存短板等不足，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民营经济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依旧不牢固

一是高层次人才缺乏，研发人员占比不高。科技创新起关键作用的是人力资本的素质和能力。近年来，高技能蓝领工人、高素质科技人

才招引难、留人难，成为民营企业普遍难题。2023 年全国工商联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研发投入前 1000 家民营企业研发人员总数达 175.62 万人，研发人员总数占员工总数的比例为 13.80%，与国际上先进企业占比为 20.00%—30.00% 的水平相比，企业研发人员占比偏低。江苏省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 2024 年民营经济新质生产力发展问卷调查显示，40.00% 的受调查企业反映，人才不足对开展研发创新活动影响很大或较大。

二是自有资金积累有限，研发费用外部支持力不强。2023 年民营企业成本率为 87.38%，较国企高出近 5 个百分点；从融资渠道看，2021 年有 226 家 500 强民企获得了外部经费，外部经费占总研发费用的比重小于 10.00% 的企业占比高达 77.00%。二者均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民企研发主要还是受企业内部支持，获取外部支持较少。根据 2023 研发投入前 1000 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近三年研发投入超 100 亿元的企业有 14 家，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20 亿元的企业有 85 家，研发费用总额小于 5 亿元的企业有 567 家。65.00% 的企业认为资金因素是制约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是创新服务平台滞后，成果转化支持力度不够。75.00% 的企业认为科技创新平台对企业创新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30.00% 的企业认为当前缺少技术创新服务平台。57.00% 的企业认为缺乏试用市场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有较大影响，15.00% 的企业认为缺乏应用场景对企业创新影响很大。

（二）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民营经济推动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差距

一方面，新兴及未来产业民营经济主体实力仍需提高。近十年来，中国民营企业 R&D 经费规模虽以 78.57% 的年复合增速增长，但在软件和计算机服务领域全球入榜企业数量和 R&D 经费中的占比仅分别为 16.21% 和 12.52%，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硬件和设备领域，中国大

陆民营企业数量不及美国及中国台湾，R&D 经费较美仍有差距。2022 年，硬件和设备领域民营企业有 36 家，占该领域中国入榜企业数量的 63.16%、R&D 经费的 77.93%。制药与生物技术领域的中国民营企业 R&D 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在制药与生物技术领域，美国企业在该领域全球企业中的数量及 R&D 经费占比分别为 55.14% 和 52.09%，中国民营企业有 73 家，占比分别为 15.02% 和 5.13%，R&D 经费投入总额也均低于欧盟、德国及日本入榜企业总体水平。此外，中国民营企业 2022 年 R&D 经费强度为 10.59%，尚未达到该领域企业 16.90% 的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壮大产业集群规模仍需强化。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 17 个国家制造业创新集群，涉及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网络安全、数字化与自动化、量子计算、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多个重点新兴技术领域。美国制造业的产业集群每年为国家经济贡献超过 2.3 万亿美元，并提供了超过 1200 万个高薪酬的就业机会，同时在私营部门的研发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推动美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在欧洲，众多中小型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在提供就业机会和工资总额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分别占据了 39.00% 的就业岗位和 55.00% 的工资支付总额，工资水平也比非集群企业高出 11.00%。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经济在推动产业集群规模壮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需进一步强化。前百大产业集群中聚集了高达 180.1 万家私营企业，它们孕育了近 5 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000 家获得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称号的企业以及 1800 家上市公司，这充分证明了民营经济在产业集群中的核心作用和重要性。然而，我国民营经济在壮大产业集群规模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一些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相对滞后，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部分民营企业在转型升级、技术创新等方面还存在不足，难以适应市场变化和竞争需求。

(三) 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 民营经济深度转型升级存在短板

一方面, 我国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和速度受限于认知、资金、技术、人才等多种因素影响, 不同程度存在“不能转、不想转、不会转、不敢转”等问题^[18]。根据江苏省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对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问卷数据显示, 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全面开始数字化转型的占比较低, 其中仅 20.97% 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全面开展数字化, 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与市级专精特新企业只有约 7.38%。多数专精特新企业只在生产或管理方面进行数字化转型工作, 其中 30% 左右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业务方面实施数字化转型, 而 15.00% 左右的企业在生产制造核心业务方面开展数字化转型。

另一方面, 绿色化转型模式单一。民营企业主要通过重新选址、延伸产业链、优化产业结构、绿色产品设计等方式进行绿色转型的降碳规划。江苏省工商联对 1032 家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调查结果显示: 在“双碳”政策的引导下,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分别各有 53.70%、54.30% 和 66.90% 的企业投入污染防控。民营企业通过转向投资低污染、低能耗的产业、规划研发绿色产品、推行生态设计的比重分别仅为 18.90%、22.10% 和 23.50%, 另外还有 18.30% 的企业搬迁进入工业园区。数据表明, 民营企业在废旧产品综合利用、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发展等方面还有巨大发展空间。

五、民营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路径

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我国新时代激发新动能的关键手段, 是在全球竞争中塑造新优势的关键突破口。民营经济需以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平台、高素质人才协同体系助力创新能力自主化, 以激发活力、集群发展优化创新性要素配置效率, 以巩固实体经济、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助推产业结构深度升级等措施进一步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 以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平台、高素质人才协同体系助力创新能力自主化

科技创新是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发挥好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作用, 关键就是要强化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紧扣产业发展需求, 形成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民营经济发展动力。

一是攻克靶向产业“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一方面, 龙头企业要发挥带动引领作用, 引导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联合攻关, 聚焦重点产业链核心零部件开展研发合作, 解决“卡脖子”问题、补齐短板, 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另一方面, 政府部门要精准研判阻碍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因素, 进行分类施策、精准扶持, 引导民营企业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指引, 实现重大应用研究与成果产业化的新突破, 提升科技创新的转化落地能力。

二是加快创新平台建设, 优化创新环境。首先, 针对高端创新资源薄弱、支撑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下大力气建设高标准创新实验室等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 发挥其资源整合能力、技术服务能力和共性技术突破等作用, 真正让民营企业“想创新”。其次, 要优化政府职能, 持续优化和完善创新政策体系, 着力提高企业创新政策的精准性, 为民营企业打造有针对性的良好创新政策环境, 解决单个民营企业研发资金和能力不足的问题, 真正做到让民营企业“敢创新”。最后, 要积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 通过与科研院所、高校开展产学研深度融合, 推进协同创新体系建设,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真正做到让民营企业“能创新”。

三是增加研发投入, 加强产学研合作。一方面, 以社会需求为指引, 优化大专院校和技校等教育机构的专业布局和灵活调整机制。同时, 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与高等教育机构在课程设计、实习基地建设以及产学研一体化等领域深化合

作。充分利用院校在科研、师资力量和环境方面的优势，以及企业在研发、应用和工程实践方面的专长，建立稳固的沟通和交流平台。促进教师深入企业实践，让行业专家参与教学活动，从而扩大专业技能人才和新兴领域人才的培养规模。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政策优势，积极吸纳贤能之士，建立健全民营经济在培养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和留住人才方面的机制。同时，需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壁垒，以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为标准，探索并建立人才分类评价体系，采取多种措施解决民营企业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所面临的难题。

（二）以激发活力、集群发展优化创新性要素配置效率

一是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加快技术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企业家精神是最稀缺的资源，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构建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发育壮大的生态环境，真正收获企业家精神的“金山银山”。引导企业完善人力资源制度，着力于人才培养、薪资水平和奖励机制等方面的建设，改善住房设施，创造有生机、宽松自主的工作环境和良好的居住环境从而吸引人才、稳定人才。畅通从高校和科研院所到企业从事科技创新的人才流动机制和保障机制。完善民营企业人才引进、培养、使用的政策和法规，在人才成长预期、培养交流、荣誉奖励、职务晋升等方面给予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同等的机会，消除专业人才到民营企业就职的后顾之忧。

二是拓宽创新融资渠道，缓解企业创新资金困难。加大政府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建立科技金融合作机制，加强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的结合，发挥财政科技投入的杠杆和增信作用，引导和鼓励金融产品创新，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加大力度支持民企进入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融资，鼓励和支持改制上市，扩大未上市的高新技术民营企业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试点范围，鼓励科

技型中小企业在创业板上市。完善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发展创投、风投等基金，鼓励金融机构提高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比例。

三是加快市场主体培育，构筑链主企业对集群发展带动作用。为了提升产业集群的核心实力，重点培养一批具有显著影响力、卓越创新能力和强大带动作用的领军企业，努力塑造具有生态优势和全球竞争力的顶尖企业，不断巩固企业在技术和市场上的领先地位，打造从“主导企业—供应链—产业集群”的连贯发展模式。利用主导企业的引领作用，通过大型企业带动小型企业，形成以龙头企业为支点推动整个供应链发展的“点线结合”的模式。发挥“链主”企业产业生态主导作用，带动中小微企业发展，促进集群内的中小企业朝着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新颖化的发展方向前进，努力塑造制造业领军企业。增强对高成长企业的培养和支持，专注于培育一批具有“独角兽”潜力的企业，持续探索和开发新兴产业链中的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

（三）以巩固实体经济、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助推产业结构深度升级

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过程，也是主导产业、支柱产业迭代升级的过程。各级政府应当引导民营企业立足资源禀赋特色和战略定位，主动投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结构高端化。

一是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数字化转型进度。明确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差异化路径选择，因地制宜、分类实施、加速推进。对于数据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实施从研发到销售的全链条数字化赋能行动，整体布局转型，并将人工智能辅助研发等技术作为突破方向，依托数字化协同平台开展上下游联合攻关，以数字化支点撬动高质量发展。对于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汽车制造、船舶制造，需将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作为实施重点，打造超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推动复杂产品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推动

云设计云仿真云验证。对于技术与能源密集型产业，如钢铁、化工等企业，应将智能化生产、绿色安全生产、一体化数字管控作为实施重点，以先进信息技术与能源生产、传输、存储、消费等环节深度融合，持续催生基于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体系下的综合智慧能源服务、供需互动等能源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消费品行业，将自动化、连续化、柔性化以及定制化生产作为实施重点，特别聚焦工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的贯通，形成需求定义设计和制造的新供求关系。

二是进一步丰富民营经济绿色化转型方式。首先，充分利用政策机遇促进绿色发展。借助本轮自上而下的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强化政策补贴效应，通过引进技术和先进设备，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和碳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绿色生产。其次，充分利用好产业结构优化机遇促进绿色发展。利用好光伏、锂电等新能源产业链优势，赋能化工、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实现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推动产业能耗不断降低。最后，充分利用好绿色金融推广促进绿色发展。进一步推广“碳效贷”“数碳融”“光伏贷”等绿色金融产品，将贷款定价与企业绿色低碳行为进行挂钩，定期根据企业碳排放情况进行贷款利率调整，助力民营经济绿色转型。

三是进一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首先，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选择上，要力避盲目铺摊子，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其次，政府部门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前沿科技、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推动地区民营企业聚企成链、集链成群，逐步构建一批深度融合发展的优势产业链条，最大程度发挥集聚效应，提高区域民营经济的自给能力与抗风险能力。最后，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抢抓全球科技前沿发展机遇，适度超前布局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新型存储器、光电子、量子信息、脑科学和脑机接口、碳减排与碳中和、前沿新材料、

未来网络等关键未来产业，通过提供相关政策支持，促使其尽快地把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新质生产力，打通制约企业经营发展的堵点和痛点。

参考文献：

- [1] 王浚炯. 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J/OL]. 中国商论 .<https://link.cnki.net/urlid/10.1337.F.20240902.1444.002>.
- [2] 梁雅楠, 张成, 王小广.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民营企业转型发展：困境、溯源和对策 [J/OL]. 当代经济管理 .<https://link.cnki.net/urlid/13.1356.F.20240711.1513.002>.
- [3] 赵甜, 王璐璐. 制造业专精特新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现实逻辑和可行路径研究 [J]. 科技与金融, 2024(7): 33-38.
- [4] 张沥幻, 张金昌. 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24(5): 41.
- [5] 任映红. 新质生产力提出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J]. 湖南社会科学, 2024(4): 44-50.
- [6] 黄静, 张金昌, 潘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生产力要素视角和 A 股上市公司数据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8): 8-14.
- [7] 杨军鸽, 王琴梅. 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收敛性 [J/OL].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https://doi.org/10.19331/j.cnki.jxufe.20240516.001>.
- [8] 张旭, 于蒙蒙. 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基点、内涵辨析与学理探究 [J]. 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4): 38-49.
- [9] 姚宇, 刘振华. 数字化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4(4): 162-169.
- [10] 陈梦根, 张可. 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J]. 改革, 2024(6): 58-69.
- [11] 张占斌.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J]. 东南学术, 2024(4): 1-10.
- [12] 陈伟宏, 唐子翔, 梁文亮, 等. 数字经济背景下地区

- 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的实现路径与制约因素研究 [J/OL]. 研究与发展管理 .<https://doi.org/10.13581/j.cnki.rdm.20231182>.
- [13] 葛笑天, 朱爱勋. 实施智改数转网联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J]. 群众, 2024(6): 25-26.
- [14] 沈梓鑫, 江飞涛. 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与新质生产力: 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 [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6): 115-129.
- [15] 邱斌, 吴可心. 以未来产业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 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J]. 江海学刊, 2024(4): 87-95.
- [16] 熊丽. 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N]. 经济日报, 2024-07-24(1).
- [17] 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发展稳中有进 [EB/OL]. (2024-07-15).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7/content_6963065.htm.
- [18] 史宇鹏, 王阳.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焦点、难点及进路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1): 86-95.

责任编辑: 蒋建忠

平台经济促进内需扩容提质的现实挑战与对策建议

——以江苏部分典型平台企业为例

江苏省工商联课题组

摘要: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推动平台经济在扩大内需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省工商联课题组积极开展平台企业专题调研,赴多家平台企业走访座谈,并向全省部分典型平台企业、平台用户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进行深度分析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在扩大内需战略中发挥新空间、新引擎、新动能和新支撑作用方面,面临着法治机制不完善、监管治理不到位、供给主体不平衡、要素支撑不充分、数据价值存在壁垒等方面的挑战,从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在扩大内需战略中发挥作用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平台经济;平台企业;扩大内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要着眼长远、兼顾当前,补齐短板、强化弱项,营造创新环境,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1]。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强调要“引导平台经济向开放、创新、赋能方向发展,补齐发展短板弱项,支持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中央和江苏省委高度重视平台经济发展,召开平台经济工作座谈会等,为平台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

和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文件精神,推动平台经济在扩大内需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江苏省工商联课题组积极开展平台企业专题调研,先后赴途牛旅游网、运满满、T3出行等多家平台企业走访座谈,并面向全省部分典型平台企业、平台用户,按照工业互联网、货运物流、生活服务、网络购物、教育培训、动漫娱乐等类别进行了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对江苏平台企业在创新发展、促进就业创业、赋能实体经济、加强行业自律、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深度分析研究,并针对平台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提出对策建议。

收稿日期:2024-09-19

作者简介:课题组组长为刘聪,江苏省工商联主席;副组长为郭东升,江苏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执笔人为高敏,江苏省工商联研究室主任、一级调研员;成燕,江苏省委党校教师;李卓霖,江苏省工商联研究室一级主任科员。

一、平台经济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一) 平台经济是促消费扩生产的重要载体，为扩大内需提供新空间

平台经济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扩大了交易活动的空间^[2]，推动了消费特征及趋势转变^[3]，成为大众消费的新高地，重塑了消费业态模式。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帮助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4]，降低了人工、设备、流程等生产成本^[5]，提升生产效率，在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工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2022 年上半年及 2023 年上半年相关数据显示，全国网上零售额等呈现较快速度的增长（见图 1）。

(二) 平台经济是创新发展抢占机遇的重要依托，为扩大内需提供新引擎

平台经济突破了商品生产、交易和消费的时光限制^[6]，降低地区间交易成本、扩大交易范围，

打破创新要素的流动壁垒，扩大了全球消费市场并助力国际竞争。数字化平台正逐步从以信息共享和商品营销为主向研发、制造、运营管理等多个产业链渗透^[7]，这种趋势对激发消费需求，助推经济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深刻意义。

(三) 平台经济是稳就业促创业的重要渠道，为扩大内需提供新动能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8 月底，我国登记在册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企业就达 2300 多万户，占全部企业的 46.40%。由微信公众号、小程序、视频号、微信支付、企业微信等构成的数字生态，催生就业机会超过 5017 万个，平台经济开拓了就业渠道，提供了创业舞台，催生了新兴业态^[8]（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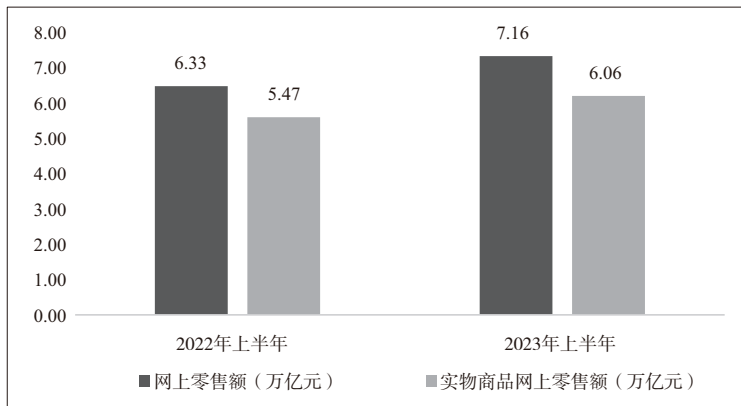


图 1 2022 年上半年、2023 年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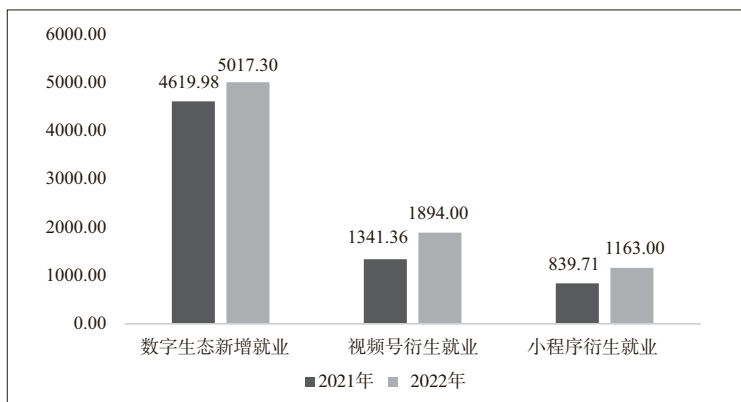


图 2 2021—2022 年平台经济新业态催生就业机会（万个）

(四) 平台经济是畅通循环提升效率的重要抓手, 为扩大内需提供新支撑

通过平台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的集成和大数据分析, 优化了生产过程和环节, 提升了资源拼凑能力和数字化治理能力^[9]。通过海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赋能^[10], 有利于不同地域的小微企业连接客户, 融入大市场, 打破产业壁垒, 消除“数据孤岛”, 实现生态协同。平台经济降低了搜索和匹配成本^[11], 提升了供需对接准确性, 提高了产业链供应链效率。

二、江苏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显著特征

(一) 平台经济规模总量稳步提升

2022年, 江苏省数字经济规模超5万亿元, 占全产业的比重达到41.67% (见图3)。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1.50%。全省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实现利润、研发投入分别同比增长17.80%、11.70%, 分别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4.5和4个百分点。2022年, 江苏省实现网络零售额超1.2万亿元, 同比增长5.10%, 位居全国第三。2023年上半年, 年销售收入超过500万元的571家平台企业销售收入3761.5亿元, 同比增长3.90%; 实现利润总额137.3亿元, 同比增长48.80%。其中, 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70%。江苏省网络货运平台发展位居全国前列, 无车承运人企业交易额、货物流量等指标均为全国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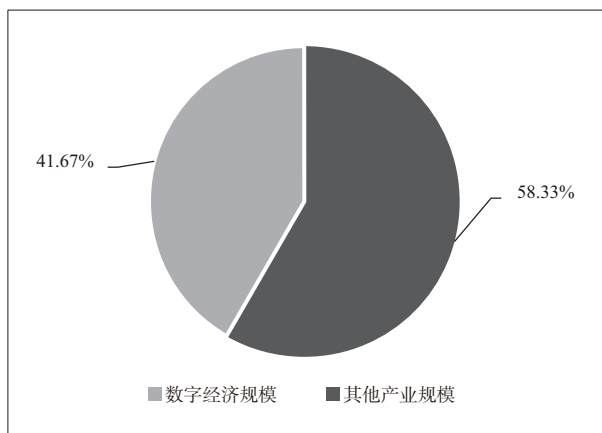


图3 2022年江苏数字经济规模占比情况

(二) 平台经济集聚特征明显

从地区看, 超八成平台企业集聚在苏南地区, 企业总部主要集中在南京(29.40%)、无锡(12.30%)、苏州(29.40%)和常州(9.60%); 从类型看, 南京在网络购物、货运物流、生活服务等领域优势显著, 苏州在教育培训、动漫娱乐等方面发展较快, 无锡、常州、徐州则积极在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布局; 从行业看, 平台企业向移动货运、工业互联网、新能源、绿色发展等细分赛道集聚; 从企业属性看, 94%的平台企业为民营企业。

(三) 平台企业发展成长性显著

从平台运营时间来看, 成立时长超过10年的平台占比达26.03%, 成立5—10年的平台占比达45.21%, 成立3—5年的平台占比为13.70%, 近三年(2021—2023年)成立的企业占比为15.07%。从平台规模来看, 年营业收入达10亿元以上的平台占比为12.33%, 2000万元以下的占比为21.92%; 员工规模1000人以上的平台占比达8.22%, 100人以下的占比达58.91%; 用户规模达5亿以上的占比为4.11%, 用户规模5000万人以下的占比为72.60%。从平台业务发展程度来看, 21.92%的平台企业具有超广业务种类、核心业务至少涉及两类平台业务, 6.85%的平台企业具有超强的限制商户接触消费者的能力, 这些企业具备超级平台的显著特征。

(四) 平台经济赋能作用凸显

在赋能实体经济方面, 平台经济通过以下方式发挥作用: 一是通过丰富数字化消费场景, 提升平台消费创造能力; 二是通过与企业、园区、产业集群合作, 数智赋能制造业升级^[12]; 三是通过投资新兴产业, 协助提升新赛道竞争能力; 四是通过运用区块链、数字孪生、扩展现实等创新技术打造面向未来的多元应用场景 (见图4)。在扩大内需方面, 平台经济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带动了网络消费^[13]。数据显示, 2023年上半年, 有33.93%的平台企业消费订单量得到提升, 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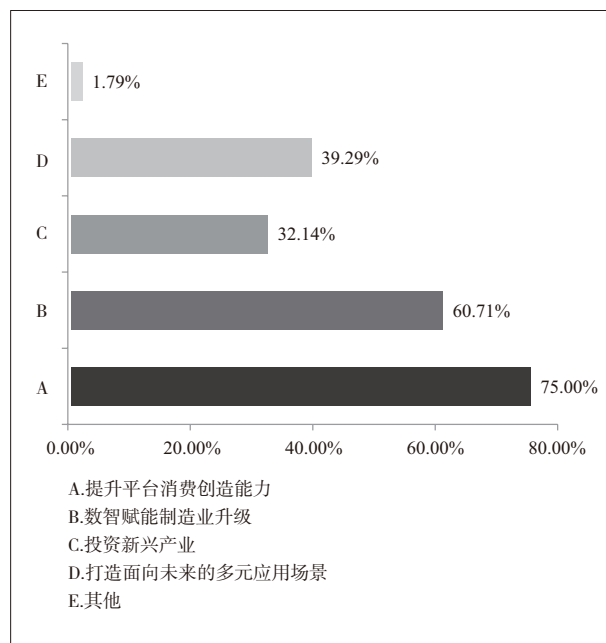


图 4 江苏平台企业助力经济转型概况

8.93% 实现了同比大幅提升。在赋能社会治理方面，58.90% 的平台企业已与政府相关部门建立了合作关系，利用平台优势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一些平台企业还通过公益助学、成立帮扶基金会等方式回馈社会（见图 5）。

三、平台经济促进内需扩容提质面临的挑战

（一）平台经济法制机制保障不完善

平台经济发展速度快、辐射范围广、影响程

度深，推动了市场运行、劳务关系、生产要素配置等规则的改变。平台经济连接多方主体、运营业务跨越多个区域，但现有法律法规仍需进一步完善。调查显示，51.79% 的受访企业认为不同区域政策标准不一，导致平台企业运营成本增加；41.07% 的企业反映区域执法标准不统一，使平台运营存在不确定性，例如地方公路运输执法尺度不一、绿通认定标准不统一以及乱罚款等现象。

（二）平台企业自身监管治理不到位

针对直播平台、外卖平台、物流平台，投诉和消费矛盾问题尤为突出，虚假宣传、虚假打折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处理产品质量问题的投诉过程中，85.00% 的受访消费者表示平台存在回避责任的情况，使得投诉难度大。此外，有 45.00% 的受访者表示，遇到了退款时限过长、无法退还全款或被强制要求改退款为换货等情况，这些问题都导致了消费意愿的降低。

（三）平台经济供给主体间存在不平衡

平台经济涉及多边市场，依赖于平台运营方、平台进驻商家、配送等多方主体的通力合作。然而，对于整合供应商资源并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平台来说，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平台供给主体之间的整合难题；二是平台合作商家的违规行为难以约束；三是平台与商家之间的利益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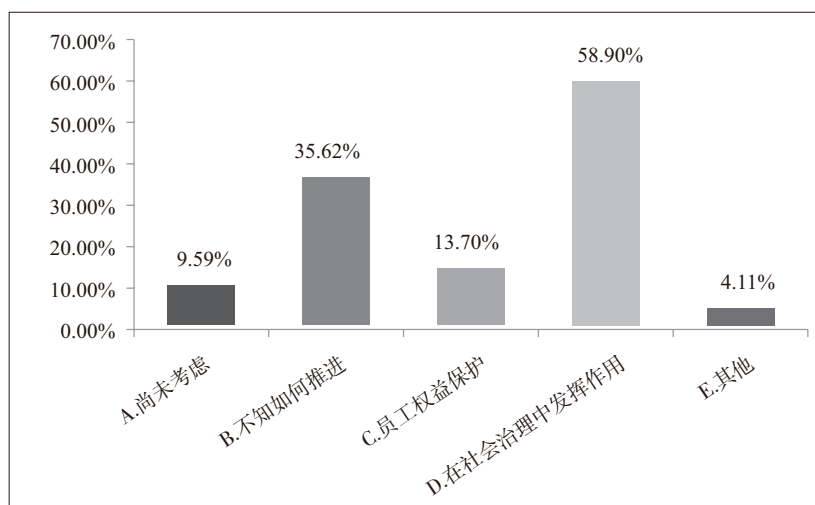


图 5 江苏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概况

存在冲突，特别是在餐饮行业，平台扣点问题尤为突出，扣点普遍在18%至25%甚至更高。

（四）平台经济发展要素支撑不充分

中小型平台缺乏有效的资本扶持。50.68%的中小型平台企业表示，“缺少资金支持，在引流方面处于竞争劣势”是其发展的一大痛点；31.51%的企业表示，当前“盈利有限、成本支出过高，尚未找到利润转正的突破口”。此外，由于长期异地通勤，工作成本高、个税标准高以及子女入学难等问题，平台企业的高端人才容易流失。

（五）平台数据价值最大化存在壁垒

调查显示，缺乏统一平台对大数据开放共享进行归口管理，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机制不完善，平台企业在获取公共数据时面临困难。平台企业的数据价值化程度较低，当前平台数据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释放。需要重视的问题包括：利用数据挖掘模型和工具来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与政府之间建立数据合作机制，以及确保数据安全等等。

四、平台经济促进内需扩容提质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平台经济体制机制，巩固扩大内需的基础

一是加快政策法规修订。要加快健全平台经济法律法规，为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深入摸排平台企业和用户面临的法律争端，对现有平台经济相关的法律进行修订和补充，包括著作权法、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税收政策等，保障平台经济中各主体的合法权益，并积极推进现有法律法规的完善。

二是强化政策法规执行。要强化不同法规之间的衔接，消除法律条款间的矛盾，确保法规的一致性。同时，提高法规与实施细则之间的衔接性，保证法规细则具有可操作性。此外，增强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的衔接，通过约束性条款强化平台规则的制定和变更过程的公开透明。平台经济的发展突破了时空边界，因此，各地政府在细

化国家法律法规执行政策时，应保证政策标准的统一或政策跨区域的互认，避免因政策壁垒增加平台企业的运营成本。鉴于平台经济仍处于发展壮大阶段，且无序竞争现象普遍存在，各地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应确保对所有平台经济主体的规则统一，为它们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三是平衡监管与发展。完善平台经济的监管机制，在对平台企业进行分类分级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超大平台作为“数字守门人”的责任，避免其利用在网络中的瓶颈位置，对用户进行有偏向性的筛选，或对自身的产品或服务进行自我优待。要创新监管方式，强化数字化监管支撑，实现政府监管的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最大限度实现全方位、全流程、全角度、多向度的监管。创新政府监管人才队伍建设机制，加快建立一支与平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监管团队。加大平台经济各领域的监管人才储备，保证监管人才队伍来源多样化、知识构成多元化，切实提升监管专业能力。

（二）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环境，提振内需增长信心

一是推动平台企业赋能提升产品供给质量。鼓励平台企业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优势，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升级。同时，支持平台企业赋能实体经济数据驱动业务发展，精准挖掘需求、对接需求、引导需求，为用户提供更为优质、精准的产品和服务。此外，鼓励平台企业帮助实体企业在原材料采购、生产、销售全流程中实现数字化质量管理，提升产品品质。支持平台与供应商协同运用数字技术实施产品溯源，增强对用户网络消费的信任度。在监管方面，推进监管部门整治和帮扶两手抓，协助平台解决产品质量问题。指导平台加强对质量信用评级低的经营者的监督，并为平台和商家提供质量技术帮扶服务。

二是强化平台企业监测和管控能力。要完善平台供应商管理机制。首先，优化供应商准入流

程，加强审核供应商资质和信誉，确保供应商的商业行为合法合规且信誉良好，守好平台的第一道关卡。其次，加强供应商的质量监管，建立完善的质量监管体系和流程，并设计针对不合格供应商的处罚和退出机制。此外，建立供应商信用管理体系，科学设置信用评估、信用应用机制，保证信用评价体系的透明性和公正性，从而建立良好的平台经济生态体系。

三是督促平台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完善多元化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创新网络消费维权模式，提高网络纠纷处理效能。加大信息安全投资，优化消费者信息授权、使用制度，保障消费者信息安全。为了优化平台的点评机制，既要探索创新点评形式，杜绝商家控评现象，保证点评真实性；也要完善司法与行政对接机制，有效应对和处置恶意投诉举报行为，保障商家的合法权益；此外，还要完善点评管理体系，对投诉的响应、内容核实与处理以及处理结果的反馈实施全过程管控，保证对投诉的有效处置。

（三）构建高效协同生态体系，促进产需有效对接

一是鼓励平台企业引领生态系统开放创新。鼓励头部平台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带动平台生态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包括建设开放共享的云平台、提供低代码驱动的数字化平台工具、推进软件开源社区和生态联盟的建设等。同时，推动平台企业间的合作，依法依规有序推进生态开放，并按照统一规则公平对外提供服务，避免恶意不兼容或设置不合理的程序要求。平台运营者不得利用数据、流量、技术、市场、资本等优势限制其他平台和应用的独立运行。此外，还应推动制定云平台间系统迁移和互联互通的标准，以加快业务和数据的互联互通进程。

二是更好对接需求市场。鼓励平台企业通过流量扶持、场景创新、产品共建、中台赋能等方式，帮助商家构建持续进阶的增长曲线。此外，优化消费者付款流程，帮助品牌商家快速回笼资金，

为符合条件的品牌商家匹配专属流量策略。同时，在数字化投放和会员渠道等方面，为商家提供便捷、个性化的服务，以提高营销效果和转化率。这有助于商家与消费者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实现供需双方的最优匹配。

三是健全从业者权益保障机制。提升劳动法律监督的实效，应督促平台企业履行用工责任，并健全维权保障机制。同时，指导企业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申诉制度，确保劳动者的诉求得到及时回应和公正处理。此外，积极参与立法机关的立法调研，提供数据资料，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强化平台经济要素保障，提升内需增长的支撑力

一方面，坚持系统观念，统筹人才队伍建设。强化重点领域的数字化高端人才培养。要发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先导作用，加强数字化领域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建设工作。同时，要推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数字化、智能化升级。鼓励智能化就业服务平台建设，优化招聘信息推送、人岗智能匹配等个性化就业服务，提高人才供给和人才需求的对接效率。此外，还要完善数字化人才的配套政策。鼓励地方政府探索针对高端数字化人才的优待政策，实施税收补贴，并解决其子女入学、落户等现实需求，提升高端人才获得感。针对兼职类数字化人才收入不稳定的特点，推动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险体系，从制度全覆盖到人员全覆盖推进，并研究制定更加合理的缴费水平和断保处理办法，维护各类数字化人才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引导资本有序流动。引导资本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积极有为，更好地服务于平台经济并助力扩大内需战略。同时，本着界限清楚、规则透明且易于判断的原则，守好资本扩张的边界和底线。此外，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最大限度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的行为。

(五)挖掘平台经济数据价值,激发内需潜力的充分释放

一是完善平台经济生态内部数据共享机制。鼓励平台经济生态系统探索平台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办法,并建立数据确权授权机制。根据数据来源和数据生成特征,分别界定数据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各参与方的合法权利,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推进数据按市场化方式“共同使用、共享收益”的新模式。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充分利用其数据主导优势,与生态系统内的其他企业建立数据共享机制,探索多样化、符合数据要素特性的定价模式和价格形成机制,推动平台、企业用户与个人用户在数据市场上实现自主定价。此外,鼓励平台企业创新数据产品,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接入成本的数据服务,赋能平台经济生态内部所有企业提升数据处理能力,释放数据在挖掘用户需求、驱动智能化生产、推进精准化营销、优化供需对接方式等方面释放巨大价值。

二是推进公共部门与平台企业间数据共享。建立规范有序、安全高效的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机制,持续推进不承载个人信息和不影响公共安全的公共数据向平台经济生态系统开放共享,降低平台企业的数据获取成本。同时,加强政府与平台企业之间的数据合作。鼓励平台企业利用其数据技术优势,投身到公共数据的开发和利用中。在遵守数据安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帮助政府提升数据驱动的决策能力。此外,强化政府在数据驱动决策中的自主意识,以及平台企业在数据赋能中的社会责任。鼓励平台企业在保障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向政府开放平台数据,在政府制定扩大内需相关政策时,提供需求侧行为特点、趋势预判,供给侧能力概况、产品服务供给特性等方面的翔实数据,助力提升政策实施效果。

三是推进平台数据常态化监管保障数据安

全。加强政企协同,保障数据安全法律法规政策落实到位。在政府层面,应加强部门间的配合,形成合力,监督各地区对数据安全相关法律的应用;在企业层面,应培养企业的数据安全意识文化,鼓励平台企业加大在数据安全方面的科研投入,确保在不泄露原始数据和降低隐私保护程度的前提下提高数据使用效率。同时,优化体制机制,对平台经济数据安全实施全链条监管。依托各类政务服务窗口、行业自媒体门户、企业宣传教育平台等,加强数据安全教育与宣传。在数据开放、共享、交易、使用过程中,加强对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私等数据的安全审查,完善跨境数据流动“分级分类+负面清单”监管制度。此外,结合数据安全问题的技术性特征和涉及的主体特征,构建科学的责任认定及追究机制,详细规定危害数据安全行为的追责方式、程序、范围,并严格落实追责效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N]. 人民日报, 2021-03-16(1).
- [2] 骆品亮, 傅联英. 零售企业平台化转型及其双边定价策略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 2014(10): 1-12.
- [3] 成燕, 梅姝娥, 仲伟俊. 用户隐私风险感知对平台社交账号登录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20(12): 196-207.
- [4] 孙新波, 张明超, 王永霞. 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促进数据化商业生态系统构建激励案例研究[J]. 管理评论, 2022(1): 322-337.
- [5] 朱勤, 孙元, 周立勇. 平台赋能、价值共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9(11): 2026-2033.
- [6] 范如国. 平台技术赋能、公共博弈与复杂适应性治理[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12): 131-152.
- [7] 肖静华. 企业跨体系数字化转型与管理适应性变革[J]. 改革, 2020(4): 37-49.

- [8] 黄益平. 平台经济: 创新、治理与繁荣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2: 20-21.
- [9] 赵宸宇, 王文春, 李雪松.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J]. 财贸经济, 2021(7): 114-129.
- [10] 池毛毛, 叶丁菱, 王俊晶, 等. 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如何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基于数字化赋能的视角 [J]. 南开管理评论, 2020(3): 63-75.
- [11] 张振刚, 张君秋, 叶宝升, 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2(11): 114-123.
- [12] 孙新波, 苏钟海. 数据赋能驱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敏捷制造案例研究 [J]. 管理科学, 2018(5): 117-130.
- [13] 周文辉, 邓伟, 陈凌子. 基于滴滴出行的平台企业数据赋能促进价值共创过程研究 [J]. 管理学报, 2018(8): 1110-1119.

责任编辑: 蒋建忠

理论认知、现实困境、实践反思、路径探索： 宗教中国化基层工作实践问题探析

赵晓锋

摘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的重要创新,本质上是一个实践问题。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基层社会治理、地方文化建设、宗教教职人员能动性发挥等层面厘清思想认知。从当前情况分析,宗教中国化的基层实践还处在起步阶段,在理论认知、实践路径、工作力量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内涵和外延、特殊与普遍、内因与外因、远期与近期等方面进行思考。在此基础上,立足地方实际,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夯实基层宗教工作网络责任制,探索制订评价指标体系,强化工作力量,从而推进宗教中国化落地落实。

关键词:宗教中国化;新时代宗教工作理论体系;宗教工作;实践问题

新时代以来关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认识,体现出从理论创新向注重实践的转变过程。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明确,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从“坚持方向”到“深

入推进”,再到“系统推进”,体现了要着力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实践工作的政策指向。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新时代宗教工作的重大理论原创,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新成果,为新时代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指明了工作方向,是新时代宗教工作实践的重大战略任务和根本遵循。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工作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研究基层统战干部、宗教界人士对于宗教中国化的理论认知、分析基层实践中存在的重点问题、反思当前工作实践得失,对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至关重要。

收稿日期:2024-10-15

作者简介:赵晓锋,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主任,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专家组成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宗教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研究”(20&ZD25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理论认知：宗教中国化基层工作实践的应有之义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事关基层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需要厘清思想认识，梳理基层实践与社会治理、地域文化建设、工作队伍建设等各方面关系，这是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

（一）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本质上是一个实践问题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实践不仅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马克思突出实践的意义，认为科学的理论不应该仅仅是解释，不能纯为从理论到理论的阐释，并特别指出解释的哲学应该提升为行动的哲学……研究宗教也应该尊重事实、深入实际，突出其实践的意义及启迪。”^[1]2021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提出了“九个必须”，“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本质是一个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时代产物，立足国际国内的宗教情势，系统回顾总结了宗教工作实践的成败得失，创新性地提出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这既是基于建党以来宗教工作实践的理论升华，也是重要的实践指引。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理论需要在实践中加以研究，通过实践进一步检验升华，再回归实践、指导实践、推动实践，实现宗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互动。

（二）宗教中国化的基层落实需要与社会治理相结合

宗教中国化的落实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2019 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

社会学家杨庆堃提出了弥漫性宗教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中国社会宗教的情况。他认为，“弥漫性宗教的信仰和仪式作为社会组织模式整体的一部分，在散开的形式中，宗教发挥着多样的功能，以组织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3]。他以寺庙为例论述宗教的社会功能，“大量的寺庙承担着维护社会关系的功能，从家庭幸福、护佑社区，到政府行为、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等各方面，事无巨细”^[4]。这一观点对于今天我们理解中国宗教与社会关系、理解宗教中国化基层工作实践仍有启发意义。宗教事务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宗教本身不仅是一种文化形态，也是社会组织、社会实体，宗教治理工作不仅事关意识形态，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安定，是社会治理必须做好的重要方面。宗教中国化实践中面临着商业化、网络化、极端化等问题，具体到基层工作中碰到的诸如宗教房产用地矛盾、宗教活动混乱无序、宗教界兴办社会事业、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等，这些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不仅仅是宗教工作部门的事情，也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全盘协调、统筹各方来解决，需要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来解决。

（三）宗教中国化的基层落实需要与区域文化建设相结合

宗教与文化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宗教中国化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题。在 2016 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5]。他在 2021 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6]。“中国传统文化宗教是一种弥漫性宗教，……其特质就是其教义、仪式与组织都与其他世俗的社会生活与制度混而一体。”^[7]文化认同又是最根本的认同，没有文化认同，也就谈不上社会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必须重视文化层面

的实践。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题中之义。北京大学张志刚指出，“宗教中国化”主要内含三重义理，即真正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其中，“‘真正融入中华文化’暨‘真正认同中华文化传统’，乃是真正融入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首要条件或根本要求”^[8]。新时代以来召开的两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都注重中华文化在推进宗教中国化工作中的作用。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之间文化形态、生活习俗等差别巨大，推进宗教中国化工作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需要因地制宜，与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相适应，与不同地域文化形态相契合。

（四）宗教中国化的基层落实与人的主体性关联

在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工作中，基层宗教工作干部的引导、宗教界人士的推动、专家学者的研究阐释、信教群众的身体力行都需要发挥人的主体性。其中，宗教团体、教职人员、信教群众是宗教中国化的主体力量，是宗教中国化的内因；党和政府的引导是外因，外因需通过内因起作用。回顾历史，在各大宗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总有一批高僧高道等杰出的宗教领袖，有力推动宗教与政治、社会、文化的适应，实现创新发展，使宗教更加契合中国社会、中华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释道安、释慧远、鸠摩罗什，隋唐之际的慧能等，投身佛教译经解经，推动佛教从出世到入世，从弃国离家到护国孝亲，从向往天国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产生了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注重神仙崇拜，追求长生不老，在历史上出现低俗化、诡异化时，总有高道借助儒家道家等思想资源，推动教理教义创新发展，发展出重玄学、全真道等新的宗教派别，更好适应当时的社会实际。伊斯兰教也是如此，王岱舆、刘智、马注等穆斯林先贤“以儒诠经”，坚持将伊斯兰教与儒学相结合，推动伊斯兰教逐渐融入中华文化。当前，我国宗教中国化，同样需要一批有宗教造诣、有传统文化涵养的宗教人

才队伍。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宗教中国化历史必然性、极端重要性、现实针对性的认识，是做好宗教中国化的前提基础，关系到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实践成效。

二、现实困境：宗教中国化基层工作实践调研分析

本文基于J地区为重点的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分析对宗教中国化的认知理解，厘清宗教中国化基层工作实践的现状、难点问题，继而提出宗教中国化基层工作实践的路径思考，为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基层落实提供理论参考。

（一）宗教中国化基层工作实践现状

J地处于东部发达地区，宗教中国化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研究该地区宗教中国化的重点、难点、问题及路径，具有“解剖麻雀”的意义和效果。2023年以来，根据J地区宗教分布格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宗教工作情况等因素，课题组一行分别赴4个设区市进行了专题走访调研。以宗教工作干部、宗教界人士为重点，发放了“关于宗教中国化的认识与实践”网络问卷，回收问卷7409份，有效问卷7409份，统计汇总出一手资料（见表1）。

表1 问卷样本重点特征情况

| | 样本特征 | 频次（次） | 百分比 |
|-------|------------|-------|-------|
| 职业领域 | 党委统战部门 | 315 | 4.3% |
| | 乡镇、街道/社区、村 | 3651 | 49.3% |
| | 宗教工作部门 | 433 | 5.8% |
| | 宗教界 | 1961 | 26.5% |
| | 其他 | 1049 | 14.2% |
| 受教育程度 | 本科 | 2464 | 33.3% |
| | 初中 | 1239 | 16.7% |
| | 大专 | 1826 | 24.6% |
| | 高中/中专/技校 | 1452 | 19.6% |
| | 硕士及以上 | 230 | 3.1% |
| | 小学及以下 | 198 | 2.7% |
| 信仰状况 | 佛教 | 1527 | 20.6% |
| | 道教 | 197 | 2.7% |
| | 伊斯兰教 | 99 | 1.3% |
| | 天主教 | 83 | 1.1% |
| | 基督教 | 1784 | 24.1% |
| | 民间信仰 | 84 | 1.1% |
| | 无宗教信仰 | 3635 | 49.1% |

在实地走访和个案访谈的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获得的实证数据,通过综合分析,对当前我国宗教中国化工作实践的基层认知情况、特点、问题等有了基本判断。

一是宗教中国化的基层工作实践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理论层面上,“怎么看”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学界、政界、宗教界等围绕宗教中国化的历史与现实,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基本完成了理论内涵阐释、逻辑梳理、话语建构等问题,为宗教中国化实践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支撑。实践层面上,“怎么办”的问题还处在起步阶段,工作实践的理念、机制、方法、路径还处在积极的探索中,从问卷调查来看,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关于宗教中国化的知晓度还不够。各级党委统战部门、宗教工作部门和宗教界对宗教中国化的了解和熟悉程度较高,但乡镇(街道)、社区(村)层面的调查对象选择“很熟悉”的人仅 13.6%,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宗教中国化”的宣传教育还不够深入有效。另一方面,宗教中国化工作实践还面临诸多问题。调研中,各方普遍认为宗教中国化的基层实践还有待破题,需要下功夫解决“怎么做”的问题。问卷调查中,“不知道怎么推进中国化”的占 38.6%,认为“缺少有可操作性的工作指标”的占 61.7%,认为“没有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制度”的占 54.1%,认为“缺少懂中国化的宗教人才”的占 68.1%(见表 2)。

表 2 您认为宗教中国化实践中存在哪些问题?(多选)

| 选项 | 选择次数(次) | 百分比 |
|--------------|---------|-------|
| 不知道怎么推进中国化 | 2856 | 38.6% |
| 缺少有可操作性的工作指标 | 4574 | 61.7% |
| 没有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制度 | 4007 | 54.1% |
| 缺少懂中国化的宗教人才 | 5045 | 68.1% |
| 其他 | 1953 | 26.4% |

二是宗教中国化的工作实践大部分还停留在表层的工作上,对于宗教中国化的内在要求着力

不够。宗教中国化包括神学思想、教规戒律、管理体制、崇拜礼仪、宗教建筑、宗教艺术 6 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神学思想中国化是核心,是宗教中国化的“魂”,是打基础、管根本、利长远的工作。从问卷调查看,对于宗教中国化内容的认识并不十分精准,没有反映出教义思想中国化的重要地位,73.6%的人认为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点是“宗教组织体系、管理模式”,60.0%的人则选择了“宗教活动的仪式、制度”。调研中还发现,当前基层宗教中国化工作实践多停留在场所建筑设计、环境氛围营造等外在层面,对于宗教中国化论及较多的是“四进”(国旗、宪法法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宗教场所)等一些传统的、表层的工作,在宗教教义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通阐释上着力不多,深层次的工作实践较少。

三是宗教中国化工作实践处在自发转向自觉的过渡阶段。如果说,历史上宗教中国化的实践处于自发状态;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增强,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强化,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的自觉性也在不断增强,具体表现在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建构,以及实践上主动性、主体性的不断凸显。调研中发现,在关于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思想认识和工作实践上,无论是宗教界人士还是宗教部门工作人员,逐渐从过去的被动改变向主动作为转变。这一点在问卷调查中也有体现,例如,对于“我国宗教中国化未来”,87.5%的人表示比较乐观,56.2%的人表示很乐观。

(二) 宗教中国化基层工作实践的难点

当前宗教中国化的基层实践在认知理解、实践机制、工作力量支撑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宗教中国化的工作实践成效,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并加以解决。

一是总体认知还不够深刻,呈现多元多样的特点。调研发现,不同宗教、不同地区、不同职业领域的人对于“宗教中国化”的认知还存在着

多样化的差异,有的甚至还有较大差距。一些宗教工作干部与宗教界人士对于宗教中国化的理解呈现出多元多样的特点,对于理论政策的认识把握有些还不够准确,需要进一步校正。问卷统计发现,关于哪个群体最了解宗教中国化的情况,来自设区市、县(区)统战部门和宗教工作部门的人大多认为“宗教工作干部最了解”,乡、村的统战干部以及宗教界人士认为“宗教界最了解”。关于五大宗教中国化程度的认知情况,受访者认为佛教的中国化程度最高,其次是基督教,后面依次是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问卷中对宗教中国化程度赋值1—5分,1分代表中国化程度低,5分代表中国化程度高。从问卷结果看:受访者认为佛教的中国化程度最高,为3.89分;其次是基督教,为3.15分;伊斯兰教和道教次之;天主教的分值最低,为2.55分。关于宗教中国化重点内容的认知情况,党政部门更关注“宗教教义思想的中国化”,宗教界更关注“培养中国化的教职人才队伍”。65.5%的人选择了“宗教教义思想的中国化”,比例最高;其次是人才培养问题,57.9%选择了“培养中国化的教职人才队伍”。

二是实践路径还有待拓展。一方面,工作路径还比较单一。总体来看,近三分之一的问卷调查对象对宗教中国化实践效果不太肯定。其中原因,首先是形式化。一些宗教工作干部、宗教界人士对于宗教中国化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形式上。例如,部分地方把“四进”等同于宗教中国化,个别场所生硬地阐释“和”“仁”“义”“诚”等传统观念,使广大群众不明所以。其次是同质化。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宗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大多数宗教场所和宗教工作部门基本围绕日常工作展开,内容上缺乏新意,没有突出核心内容,形式上也缺乏创新。最后是零散化。当前的宗教中国化方面的工作多是结合某一点来做,缺少系统性、整体性、持续性。另一方面,缺少可操作的工作评价体系。调研发现,不少宗教工作干部、宗教界人士对宗教中国化实践感到困惑,对于具

体怎么做说不太清楚。基层工作干部认为需要一些比较明确的指标体系,这对工作有较强的指导意义。问卷调查中,认为需要列出宗教中国化工作指标体系的人占84.1%。以某市基督教为例,部分场所负责人在访谈时表示由于没有相对统一的“基督教中国化”标准,各区、各堂点认识差异大,工作各有侧重,推进力度不同。

三是工作力量支撑不足。一方面,宗教界人才较为缺乏。调研中发现,五大宗教基本都面临着人才难以为继的现状。以某地佛教为例,佛教教职人员约四分之三为高中以下文化水平,佛教出家僧人逐渐减少,人才储备严重不足,其他宗教也存在教职人员文化程度不高、后备人才缺乏的现象,宗教界人才不足,难以有力支撑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另一方面,宗教工作部门力量不足。机构改革以后,基层统战、民宗等工作力量得到整合,基层民宗工作整体上更加有力有效。与此同时,基层宗教工作力量薄弱的问题也凸显出来。调研中发现,基层县(区)统战部宗教工作干部一般1—3人,对口设区市民宗局多个处室,承担着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对于中国化工作少有精力去思考。

三、实践反思:宗教中国化基层工作实践的 思考

理论来源于实践,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从而高于实践、指导实践。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也需要在基层的工作实践中检验和发展。围绕理论内涵、工作力量、工作路径、工作目标等进行反思,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实践落实落地。

(一)反思之一: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的内涵与外延

调研中,一些基层干部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实践需要有比较精准的定义,方便基层工作时对照操作。从理论上分析,“宗教”本身就难以定义,“中国化方向”更是难以用几句话来精准说明,难以整体作出一个简洁明了的定义。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本身就是指明一个

方向，即在政治上自觉认同、文化上自觉融合、社会生活上自觉适应。与此方向符合的就是中国化，与此方向不符合的就不是中国化。如何判断一项工作是否符合，需要较为了解中国传统的宗教关系，包括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这就需要加大宣传培训力度，让基层干部、宗教教职人员、基层信教群众充分理解相关理论知识。

（二）反思之二：实践路径的特殊与普遍

我国宗教门类多，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教，还有大量的民间信仰；宗教所处环境也复杂多样，天南地北的文化不同、社会结构不同、信教人群认知不同。这就决定了宗教中国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是各有特色、不尽相同的，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践举措和工作路径，各地宗教工作部门、宗教界可以在立足地方实际的基础上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例如，一些地区探索制订宗教中国化的指标体系，对于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一实践创新是否具有普遍推广意义，还需要各地区结合实际进行研判分析。再如，在探索制订宗教中国化指标体系时，如何全面充分反映出城市、农村不同地区宗教特点，如何准确反映五大宗教不同宗教情况，如何避免行政成本的大幅增加，如何避免形式主义等也需要加以关注。

（三）反思之三：工作力量的内因和外因

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聚力，不是仅靠宗教界自发推动就可以实现的。一方面，要加强党委政府的引导作用，既不能“缺位”，也不能“乱为”，不能以行政命令包办代替，应该方向正确、方法多样、注重实效。坚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9]。另一方面，要注重宗教界特别是宗教界人士作用的发挥，牟钟鉴提出，各大宗教都要在坚持中国化的道路上努力

前行，“这一切都要靠宗教界骨干队伍和领袖人物去推动，政界的责任是给予政治上支持，学界的责任是给予学术上配合，都不能代替宗教界人士的作用”^[10]。

（四）反思之四：关于远期规划与近期目标

宗教中国化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宗教中国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就明确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一项常规性工作，需要长期坚持、持续推进，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宜采取“运动式”“刮风式”的工作方法。同时，要深刻认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解决我国宗教领域存在问题的治本之策。不同地方在解决宗教领域问题时，要坚持以中国化这一目标为引领，标本兼治，既推动解决宗教领域的现实问题，实现当下工作目标任务；又着眼长远，不断探索建立更为适宜本地特点的体制机制，系统深入推动宗教中国化进程。

四、路径探索：宗教中国化基层工作实践的建议

宗教中国化工作实践的根本在基层、重心在基层，无论是政治上的认同、社会生活中的适应，还是文化上的融合，都是活泼生动的基层实践，都是有血有肉的基层故事，都需要从基层工作实践着眼着力。推动宗教中国化，必须依托基层治理体系，扎根基层社会，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采取接地气、可操作、有实效的举措和办法，引导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有力有方有效。

（一）优化顶层设计，夯实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工作机制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11]。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的宗教工作理论政策、宗教知识等，加大宣传培训力度，深化基层党员干部对宗教中国化的认识，切实把宗教中国化的理念落实

到基层组织建设中，加强党对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的领导，畅通宗教中国化落地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二是夯实“三级网络两级责任制”。把宗教中国化的工作网络扎进基层，把工作的主要精力投放在基层、把平台搭在基层、把措施运用到基层，让宗教中国化工作实践通过“三级网络两级责任制”的机制，真正转起来、实起来。要把宗教中国化方面的难点问题，如矛盾纠纷、非法宗教活动等，列入专职网格员网格化信息采集、巡查问题清单。通过县、乡、村三级联动、信息共享的一体化综合指挥平台，形成宗教中国化工作部署、推进、落实、督查的工作闭环，推动宗教中国化工作风险点的早发现、早处置、早排除，将宗教中国化深度嵌入基层网格化的社会治理体系。

三是探索建立个性化的宗教中国化工作指标体系。结合地方工作实际，尝试制订宗教中国化工作指标体系，解决宗教中国化难以量化的问题，为基层宗教中国化工作提供参考，探索形成可复制的经验，试点推广，为宗教中国化工作探路。指标体系可涵盖宗教人才队伍建设、依法依规办教、教义思想建设、场所建设、服务社会、构建和谐健康社会关系等方面，设置若干层级，把抽象的中国化概念条分缕析具象为一个个可操作、可量化、可评估的分类指标，从而使团体、场所的宗教中国化方向引导有了明确标杆和具体指导，在此基础上可评估级别，使宗教团体、场所、基层宗教工作部门、社区（村）等在宗教中国化方向上有路径可循，有目标可达。

（二）充实工作力量，加强宗教中国化工作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宗教界人才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12]。宗教界是中国化工作的主体，要做好人才培养规划，针对当前各大宗教教职人员普遍短缺、青年教职人才少、宗教人才队伍后继无

人、青黄不接的现状，深入分析教职人才队伍的年龄结构、层次结构、知识结构等，打造新的教职人才培养平台，加快建设宗教院校，整合社会主义学院、高校院所等各类平台，有计划地培养一批有传统文化涵养、有宗教造诣、熟悉工作实践的宗教人才队伍。

二是加强基层宗教工作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养一支精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熟悉宗教工作、善于做信教群众工作的党政干部队伍^[13]。要着力解决基层宗教工作力量不足的问题，配齐配优工作人员，创新理念，整合资源力量，想方设法解决现实问题。例如，在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区），探索在法律政策框架内，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办法，增强工作力量，解决人员不足的难题。

三是推动党政部门与宗教界协同发力。党和政府的引导、支持是前提，但宗教界是具体实施者、执行者，是宗教中国化最主要的参与者和实践者，需要宗教界发挥积极作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党委政府要发挥引导职能，但不能包办代替。双方要立足各自定位，无缝衔接，不留空白，整体发力，协同推进。

（三）创新工作思路，推进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有力有效

一是建立宗教中国化理论研究平台。坚持理论创新是建党百年的宝贵历史经验，推进宗教中国化必须重视理论研究创新，为实践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养一支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风优良、善于创新的宗教学研究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14]。要积极整合政界、宗教界、理论界的资源力量，广泛凝聚智慧力量，设立一批我国宗教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从历史、理论、实践等不同维度，开展深入研究，系统梳理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历史传统、现实问题、实践路径，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二是探索设立宗教中国化工作指导站。立足不同地区实际，出台工作意见，探索设立“宗教中国化工作指导站”，打造基层宗教中国化的服务平台、交流平台、展示平台，提供引导、指导、辅导等服务功能；依托宗教专家学者、相关政府部门等组建专家顾问团队，定期召开会议研讨工作，为基层宗教中国化实践提供政策理论支撑，指明正确方向；做好指导站体制设计，细化指导站职责、组织人员、具体分工等，通过指导站把宗教中国化工作落实好。

三是提升基层宗教工作智能化水平。针对基层工作力量不足的问题，提升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向信息技术和大数据要生产力，创新推进宗教事务信息化建设，探索建立宗教工作大数据平台，将宗教中国化内容纳入信息系统建设，发挥主观能动性，准确把握宗教领域场所动态、安全保障等，做到心中有数，为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夯实技术基础。

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立足点在基层，必须着眼于推动基层工作实践，遵守宗教工作规律，契合基层工作生态，特别是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不断夯实工作基础，充分调动和发挥宗教界、党政机关、理论界等各方力量，形成

全社会共同支持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共识和力量。

参考文献：

- [1] 卓新平. 经典与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67-68.
- [2]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N]. 人民日报，2019-11-01(1).
- [3][4][7] 杨庆堃.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 范丽珠，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V、13、IX.
- [5][9]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N]. 人民日报，2016-04-24(1)、(1).
- [6][12][13][14]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N]. 人民日报，2021-12-05(1)、(1)、(1)、(1).
- [8] 张志刚.“宗教中国化”义理研究[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11.
- [10] 牟钟鉴：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十二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64.
- [1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2021-11-17(1).

责任编辑：吉强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五个必由之路”的三维释读

朱琳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五个必由之路”的重要论断,深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立足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实践,是对“三大规律”的深刻把握,对“四个之问”的科学回答,更是对党的百年伟大实践的深刻总结。深化前进道路上“五个必由之路”的规律性认识,准确理解和把握其理论溯源、历史意蕴及时代价值,对于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根基,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学理阐释,丰富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五个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五个必由之路”的重大论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了这一论断,并对其进行了系统归纳,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1],并强调这一重要论断是“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重要的规律性认识”^[2]。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现实语境下,“五个必由之路”的重要论断展现了对新时

代十年伟大变革的深刻洞察,不仅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独特路径,也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遵循,“既是历史的总结,也是现实的结论,更是未来的路径”^[3]。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五个必由之路”这一规律性认识,对于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基,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学理阐释,丰富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准确把握“五个必由之路”的理论溯源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中,“五个必由之路”的各部分内容互为依托、相辅相成,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充分贯彻,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收稿日期:2024-08-21

作者简介:朱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创计划”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审视与建构研究”(2024-KY-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体现。准确把握“五个必由之路”的理论溯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精神实质，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提供有力的思想引导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理论基石：“五个必由之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4]“五个必由之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根据中国的具体实践进行了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等基本原理的深刻把握和丰富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部著作中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和专政中的领导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的先进性，强调“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5]。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国情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两个确立”，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政治保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社会主义视为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桥梁和必经之路。列宁也曾说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第一个词是指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第二个词是指它的下一个阶段，更高的阶段。”^[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和比较后作出的历史选择。这条道路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在一起，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广阔前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正确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多次强调人民和团结对于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性，“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7]，并大声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8]。团结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政治品格。实践证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形成强大的合力，这是中国能够在各个时期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要保证。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9]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精神特征，发展理念要与时代的特征相契合，反映出这个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思想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10]。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刻把握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强调了发展的规律性、全面性和协调性，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发展全局的深刻把握和科学规划，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全面贯彻和具体实践，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战略安排。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问题，认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组织成为一个统一有纪律的政党，才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严明的纪律和规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特性和内在品质，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有效推进各项工作的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相一致，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举措，有助于确保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二）文化根基：“五个必由之路”传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

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政治智慧、道德价值和意志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对美好生活、和谐社会等理想的精神追求，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种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是“五个必由之路”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文化根脉和思想根基，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支撑。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天下为公”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政治思想。这一思想最早记载于《礼记·礼运》篇，孔子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强调了社会和谐与国家整体利益的重要性。这一理念不仅体现了古代圣贤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而且成为后世治国理政的重要指导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必由之路”，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承载着“天下为公”的历史使命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追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党的领导确保了国家发展符合人民的整体福祉，为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萌生于商周时期的民本思想，几乎贯穿了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民为邦本”的表述最早见于《尚书·夏书》中的《五子之歌》的记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古训是大禹对后代的教诲，强调了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根基牢固，国家才能安定繁荣，深刻体现了古代圣贤治国理政的深邃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秉承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其精神实质与中国古代“民为邦本”的传统理念一脉相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2]。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仅引导中国人民选择了

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体现和发展，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国家治理体系，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行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准则。

“自强不息”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最早出自《周易·乾卦·象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它强调君子应当效仿天道的刚毅坚卓，力求进步，永不停息，同时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积极进取、坚韧不拔、勇于革新的精神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13]。团结奋斗彰显了中华民族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实现共同目标的重要动力。“革故鼎新”一直都是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杂卦》中记载“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它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变革和创新的品格，强调在尊重历史和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地进行改革和创新，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新发展理念提出，不仅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规律的新洞察，而且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提升。“天人合一”“贵和尚中”等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构成了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路径提供了思想支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正己修身”。《论语·子路》中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强调了为政者自身行为的端正对于管理和政治的重要性。此外，规矩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宝贵品格，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孟子·离娄上》记载“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吕氏春秋·自知》称“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都说明了规矩和法则在判断和行事中的重要性，强调即使是当政者也不能为所欲为，需要一些外在的标准和规则来作为参照和约束。全面从严治党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正己理念和规矩意识融入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实践中，并结合新形势新问题进行深刻理论阐发，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期稳定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障。

（三）现实依据：“五个必由之路”立足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4]正如马克思所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5]“五个必由之路”的宝贵历史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从书本中抄下来的，而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引下，中国共产党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持续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对中国发展思路和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高度概括所形成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清晰地勾勒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清晰路径，而且为党在新时代巩固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依据。

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6]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实践，理论创新必须与实践创新相结合，通过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理论。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进程，始终紧密围绕解答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时代难题而展开，它始终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时代的发展同步，与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连，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指导意义。“五个必由之路”立足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牢牢把握“变”与“不变”的有机统一，在实践中不断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

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的重要理论成果。

在“五个必由之路”重要论述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核心原则没有变，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领导地位和作用无论何时都不会改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没有变，这条道路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历史经验选择的，并且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道路，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这条光明大道继续前行；坚持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没有变，中国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团结一心、共同奋斗来克服困难、实现目标的精神是不变的，这种精神是推动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在新时代背景下，也有一些方面需要变化和创新：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实践路径会根据国内外的新情况、新问题而不断优化和创新；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路上，需要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取向，确保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五个必由之路”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同时，始终能够根据时代的变化灵活调整策略和政策，在稳定性和创新性中寻找平衡，确保党的理论和实践始终充满活力，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是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

二、正确理解“五个必由之路”的历史意蕴

“必由之路”出自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对《孟子·告子上》的“仁，人心也；义，人路也”的评论。他在《〈孟子·告子上〉注》里说：“义者行事之宜，谓认路，则可以见其为出入往来必由之路，而不可须臾舍矣。”大概意思是说“义就是做事情要公正、适宜，称为认清了解大道，便可以把它看作事物发展必须遵循的规律或者做事情必须遵守的法则，因此不可以把它很快地舍弃。”因此，“必由之路”的意思是指达到某个目标或完成某项任务所必须经过的道路或途径，强调某种

方法或策略对于实现特定目的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五个必由之路”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既是对历史经验的发展，也是对未来发展的启迪。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五个必由之路”提升到“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层面，是对党和人民奋斗历程的高度凝练，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贯通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接续奋斗的伟大结晶。

（一）“五个必由之路”是对“三大规律”的深刻把握

规律是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方向。只有深刻理解并掌握这些规律，依照客观规律行事，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是因为党始终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能够不断地认识和把握规律，成功带领人民取得了各项事业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是党在长期的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总结。这三大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遵循的最重要和最高层次的规律，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战略布局的重要依据。“五个必由之路”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理解，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丰富与发展，为推动中国及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党的执政规律是反映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应该遵循的执政理念和方略。

“五个必由之路”深刻洞察并准确把握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所面临的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挑战，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指明了党在治国理政中的关键核心地位，确保党的领导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揭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规律性认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道路问题的选择至关重要，这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五

个必由之路”明确了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和发展路径的认识，推动人们更深入地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律及其长期目标，为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指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基本规律，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特征。“五个必由之路”强调将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从全局出发看待问题，倡导要团结奋斗，统筹各方面的力量与资源，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形成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明确当前社会主义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需要用科学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在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和行动纲领，也为其他寻求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借鉴，展示了不同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化理解和科学运用。

（二）“五个必由之路”是对“四个之问”的科学回答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17]。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和高度的问题自觉，注重从历史中寻求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经验教训。“五个必由之路”是以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的历史成就和经验为依据，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科学概括，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将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治国理念，它不仅是对中国发展命题的深刻洞察，也是对世界发展趋势的积极回应，更是对人民期盼和时代要求的科学解答，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的行动自觉，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五个必由之路”展开的基本思路就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从历史分析切入，以史实为依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出新的部署。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致力于实现更高水平的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新的征程和实践，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去探索解决之道。“五个必由之路”基于中国实际情况和时代发展要求，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中国之问”给出了科学回答。当前全球正面临百年未遇的深刻变革，其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日益增加，迫切需要对“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给出深刻的理解和回应。“五个必由之路”以马克思主义的全球视野，指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要义，科学回答“世界之问”，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读懂中国打开重要“思想之窗”。“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18]新时代新征程，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面对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党始终紧扣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推进理论创新。“五个必由之路”是中国共产党立足大历史观对百年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对党的艰辛探索和奋斗实践进行了多方面的总结和阐述，为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有效回应并不断回答好“人民之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这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五个必由之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既是对奋进新时代新征程作出的战略部署，也是中国共产党直面“时代之问”的深刻回答。

（三）“五个必由之路”是对党的百年伟大实践的深刻总结

“五个必由之路”既遵循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的普遍规律，又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在发展中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体现了守正与创新相统一，使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境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性成就的凝练呈现，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宝贵财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19]“五个必由之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同时也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真理性认识成果和创造性实践成果。一方面，“守”的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观点、方法之“正”。“五个必由之路”始终强调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不偏离党的根本宗旨和初心。另一方面，“创”的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新”。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新经验，形成新理论。“五个必由之路”是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勇往直前、在新时代中建功立业提供了明确指引和理论支撑。

三、深刻领会“五个必由之路”的时代价值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务必牢记“五个必由之路”，强调“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20]。“五个必由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它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为党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五个必由之路”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重要战略指引

党的二十大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21]，强调“未

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22]。“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实现更大发展的关键阶段，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尽管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挑战，包括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国际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等，但中国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五个必由之路”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它不仅是对过往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战略的明确规划，对于引领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结合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既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也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根本保障。人民群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力量，团结奋斗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无论是在过去创造辉煌历史的过程中，还是在开辟美好未来的道路上，团结奋斗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繁荣的重要动力。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新发展理念强调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低碳、开放合作和共享成果，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辅相成，是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自我革新，坚定实施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强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领导、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显著提升，确保了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和先进性。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二)“五个必由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遵循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开篇部分指出：“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23]历史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坚定信念和高度认同，源于对我国发展历程的深刻理解和对自身文化传承的持久信心，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历史主动是指一个国家、民族或政党在深刻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在历史发展大势中展现出的积极态度和行动，主动影响和推动历史发展进程的能力。当前全球正处于一个充满挑战和变化的时期，越是在重大历史关头，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需要增强历史自觉，掌握历史主动。“五个必由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踏上新的赶考之路上作出的正确的历史判断，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理解时代潮流、积极引领历史进程的政治自觉以及坚持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主动。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把握历史规律，准确洞察历史趋势，深入分析历史发展脉络，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五个必由之路”这一重要论断，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为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实践遵循。要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其实践要求，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必须以清晰的时代洞察、坚定的历史自觉和高度的历史自信，主动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导权，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创造一份既满足历史期待、又

能回应时代呼唤、更不负人民重托的伟大业绩。

(三)“五个必由之路”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中国智慧

在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把我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经历联系起来。”^[24]“五个必由之路”的重大论断,从领导核心、制度保障、精神动力、发展方略、政治保证五个方面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的“成功密码”,不仅为继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和行动指南,也向世界展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为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贡献了富有启发性的中国智慧和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实现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它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顺应了历史规律和全球发展大势,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全人类对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普遍价值追求,这一理念为破解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世界经济社会的协同进步,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和方案。中国人民依靠团结奋斗,顺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就。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紧密相连,利益共享。中国主张在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各国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打造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呼吁全球伙伴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和谐共生、团结协作的承诺,并且已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与支持。事实证明,中国正以自身的新发展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更多合作和发展的机遇,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解决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事

务中的责任和担当,以及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贡献。

“五个必由之路”,凝聚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连接了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核心要义。在推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其理论溯源,把握其历史意蕴,认识其时代价值,进一步巩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定信心,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同,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积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踔厉奋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中挺膺担当。

参考文献:

- [1][2][13][14][20][21][22][2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70、70、15、16、70、26、25、1-2.
- [3] 辛向阳.“五个必由之路”的科学内涵与重大意义[N].光明日报,2023-02-02(6).
- [4]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5.
- [5][7][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50、66.
- [6] 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
- [9] 李捷.“五个必由之路”的历史蕴涵和现实启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6.
- [10][12][24]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29、38、320.
- [1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5.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6.

[17]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35.

[1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71.

[19]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612.

责任编辑：王天海

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实现美好生活的优势探析

董伟伟 曹凤霞

摘要: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内涵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样、差异性更加明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本文从理论、制度、实践三个维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优势进行深入探讨。理论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先进的民主理念赋予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实现美好生活理论上的优势;制度上,健全的民主制度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实现美好生活的制度优势;实践上,健全的民主环节和丰富的民主形式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实现美好生活的实践优势。

关键词:党的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美好生活;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这一概念是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阶段性转化后,中国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要的理想生活的表达。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昭示了党自诞生以来就致力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带领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内涵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样、差异性更加明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

间具有内在一致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1]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在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这一党的奋斗目标的具象化表现上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本文将从理论、制度、实践三个维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优势进行深入探

收稿日期:2024-07-16

作者简介:董伟伟,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曹凤霞,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基础和发展路径研究”(22ZDA067)、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基层数字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24YB0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讨,以期进一步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助力人民实现美好生活中的作用。

一、先进的民主理念赋予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实现美好生活的理论优势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成果,全方位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主权和人民民主的理念,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深度融合,这从根本上赋予了其在助力实现美好生活中的理论优势。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

民主理论是马克思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不仅总结了工人阶级民主革命,揭示了民主的本质,“还对资产阶级民主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与批判,他既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将民主制变成普遍制度的积极意义,也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表面上是民主与自由,而实际上是压迫与专制的本质”^[2]。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从根本上批判和超越了西方虚假、形式、空谈的民主,克服了西方“抽象的”“少数人的”民主弊端,始终坚持维护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基于“现实的人”的需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就国家是政治制度来说,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3]可以看出,马克思强调人民主权,认为人民应该参与国家的管理和法律的制定。此外,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批判了仅停留在政治权力上的民主,主张民主应该延伸到社会生活层面,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完整使用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4]来阐发自己的民主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人民主权是民主的核心,民主的实质在于实现

全体人民的彻底解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继承了马克思所讲的人民民主和人民主权理念,克服了资产阶级的抽象民主,即少数统治者的民主。

列宁在谈到民主时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5]一方面,这里的“国家形式”指政体,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形态”是指国体,即国家的阶级本质,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6]。无论是我国的国体还是政体,都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双重保障始终将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定格在与人民群众最直接、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吃穿住行”上。只有人民群众的基本问题解决完、解决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国家的全面发展不断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公民一律平等”意味着民主是公民平等拥有各项权利,承认公民的地位一律平等,不受财富、地位等的制约,不赋予任何人特权,同样意味着“实行人民民主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和发展需要,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7]。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指导下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民主理念,它始终在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发挥作用。

(二)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8]的论断。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根源上表现出与“两个结合”相契合的文化底蕴和精神价值,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了理论底蕴和价

值指引。

其一，“民本思想”中蕴含的基本生存性需要，为提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范围和层次提供了基本参照。纵观我国历史，“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始终贯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吃饱”作为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在当今仍然有重大意义。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局限于物质资料的丰盈，更多地需要精神生活的提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各项需要呈现出不断递进和满足的过程。新时代，党带领人民群众，将美好生活的理念从简单的“衣食住行”提升到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和弱有所扶”等多个领域，这不仅拓宽了人民的基本生存性需要范围，还增加了马克思所指出的享受性需要和发展性需要的内容，展现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范围和层次不断提升和拓展。美好生活并非一个静态概念，而是基于不断发展的客观现实，呈现出动态延展状态。

其二，“民本思想”中蕴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各项需要提供了价值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生性土壤，其中所蕴含的“民本思想”，不仅展现着从古至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构想，而且为当代民主实践提供了价值引领。《尚书》中的《五子之歌》记载了“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民心是国家的内核，人民是国家稳定发展的根本，只有人民安居乐业了，国家才能安宁。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从春秋时期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到清末民初梁启超倡导的“主权在民”，再到民国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强调了“民为邦本”的朴素道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理念和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则赋予了“民为邦本”新的内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的主体地位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满足全体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正是“民为邦本”理念在新时代的生动体现。

二、完善的民主制度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实现美好生活的制度优势

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这一奋斗目标，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逐步形成了行之有效、融洽衔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体系。这不仅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更好地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而且形成了有效的制度合力，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实现美好生活的制度优势。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根本制度保障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是极具人民意志和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人民民主具体地、生动地体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全过程各环节”^[9]，真正贯彻落实到代表、立法、监督等各项工作任务的全过程各环节，这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走向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必然选择。

第一，高质量代表工作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大代表是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人大代表的每一个建议，都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推动人大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高质量代表工作就是选出能够充分反映人民意志的代表，就是通过人民的一人一票选举产生每一民族、每一地区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的人。如今，我国的人大代表们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不仅具有政治职责崇高感和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感，还能够真正做到反映人民呼声，为人民根本利益发声，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新时代，我国人大工作更加注重提高建议和议案办理的时效性，确保人大代表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改善解决，促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步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第二，人大立法工作以良法促进民主发展。

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彻落实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全过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法治保障，这是我国立法工作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法律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法治是维持国家稳定的核心力量。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天然地蕴含着对民主法治的高层次追求，我国作为世界上最稳定的法治国家之一，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法治建设需求，显著提高了人民美好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三，监督工作机制厚植民主民生底色。“监督权是我国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10] 监督权的有效运作与否是关乎全国人大及地方人大是否充分了解民意、贴近民心、依法履职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关乎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实现的重要保障。民心所指、民生需求是人大监督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人大监督工作机制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承载着人民群众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把人民的所思所盼践行于具体工作之中。它不仅是净化政治生态、提升政府工作效率和质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更是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维护人民合法权益，紧贴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

（二）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和谐共治美好生活的独特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汇集人民智慧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政治创造。一方面，人民政协在和谐共治美好生活上发挥着凝心聚力的组织优势；另一方面，协商民主在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充满了“商量出办法、出共识、出团结、出感情”的中国智慧。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机构和专门渠道，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不仅悉心洞察各方面民生诉求，而且更好地凝聚了各党派、各阶层、各社会团体的共识，有效克服了阻碍美好生活实现的弊端，充分体现了有别于

西式民主的政治优势。

第一，人民政协作为践行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和谐共治美好生活的组织优势。实践表明，人民政协工作始终以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工作着力点，保障了党在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能够洞悉各方面诉求，广泛凝聚共识。同时，人民政协有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不断彰显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第二，协商民主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各项诉求，是满足人民需要的重要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11] 实践充分证明，在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阶层等密切合作、协商合作，促进了人民切身实际问题解决的科学化、民主化，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全国上下团结一心、通力合作，为更好地实现美好生活凝聚强大力量。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满足少数民族同胞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促进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制度保障。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风采各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这一特性的基础上，为保障少数民族同胞追求美好生活而形成的伟大政治实践。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保障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具有内在一致性，两者共同致力于各民族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实现共同富裕。

新时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不断深化，成果日渐丰硕。一方面，民族地区消除绝对贫困，

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长期奋斗，“民族地区 3121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民族自治地方 420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28 个人口较少的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12]。这一彪炳史册的里程碑事件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共同走向美好生活的成果。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精神生活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党和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卓有成效的区域化支持政策，保障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提升了少数民族人民的主人翁感。新时代，国家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作陆续启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日益完善，不仅满足了各少数民族地区对美好生活的艺术美、生活美等精神追求，而且有效保护了各少数民族的精神文明瑰宝。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终结了旧中国各个民族纷争与压迫的历史，促进形成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实现了少数民族地区“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协调统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书写了宏伟篇章。

（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人民直接参与美好生活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在我国民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它以保障基层民主为核心，以实现基层群众自我治理为内容，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目标导向。基层自治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维护基层民主，就必须依赖群众参与，听取群众意见，反映群众呼声。为了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城市居民委员会设置了听证制度、居民来访制度和评议会制度等，农村居民委员会设置了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村民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等，这不仅充分保障了基层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而且提供了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直接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历来是民主政治

的发源地和实验田。”^[13]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好与坏、真与假，关键看基层。20 世纪 60 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镇创造了基层自治的新样板，形成了著名的“枫桥经验”。该镇充分利用党的群众路线，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高效解决了群众之间的矛盾问题，从而促进了基层的和谐稳定。随着“枫桥经验”的不断推广，各地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以及基层党组织等社会基层组织积极进行完善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与基层组织齐心协力，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了现实。

三、健全的民主环节和丰富的民主形式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实现美好生活的实践优势

实现美好生活的关键在于建设美好生活，这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社会参与。我国发展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健全的民主环节和丰富的民主形式，在建设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有效解决了人民群众“能参与”“想参与”“如何参与”的问题。这不仅为人们向往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可看见、可参与的民主实践途径，而且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美好生活的广泛社会参与。

（一）五大民主环节的有效贯通，保障了人民建设美好生活的参与权利

五大民主环节的有效贯通，一方面加强了选举的公正性、决策的科学性、执行的有效性、监督的透明性，彰显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各环节有效参与、全时段优化贯通的显著优势；另一方面为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了有效保障^[14]。人大代表选举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首要环节，人民群众可以直接或间接选出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代表。民主协商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起重要作用，人民可以通过协商民主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凝聚全社会对“美好生活”的共识。民主决策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环节，人民群众可以把自己向往的美好生活需要通过民主决策表现出来，通过人大立法、政府决策、人民决策将创造美好生活的权利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民

主管理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可或缺的一环。民主监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国通过各种形式的民主监督，为人民的美好生活提供重要保障。

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五大民主实践的有序贯通中逐步实现。人民不仅拥有参与民主政治的权利，还拥有参与建设美好生活的权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保障人民参与权利的同时，还推动了基层群众的广泛参与，基层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着自己向往的美好生活，也感受到自己向往的美好生活已逐步变成现实。参与权利的有效保障不仅是检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属性的试金石，更是关乎数亿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活水源。

（二）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特性，激发了人民建设美好生活的主动性

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不是人民参与缺位的独角戏，而是保障人民参与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人民民主。这种民主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是真实地体现在政治生活中。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真正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产生实际效益。这种民主实践激发了人民的参与热情、意识和能力，解决了人民“想参与”的问题。它充分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人民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发挥主体作用，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体现在其覆盖全体人民和全面参与的过程。广泛性就是把人民民主运用到党、国家、社会事业的方方面面，让人民参与到党、国家、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下，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是广泛的，人民主体的权利是广泛的，参与党、国家、社会事务的范围也是广泛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就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广泛维护人民权益的环境下，使我国民主政治在人民的广泛参与中生根发芽、枝叶繁茂，充分激发人民的主动参与热情，保障人民主动参与的基本条件

和渠道。人民能够真切参与到“广泛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之中，真实体会到我国民主对比西式民主的强大优势，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参与党和国家社会事务，为实现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提供人民主体的强大优势。

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性表现在其能够真实反映人民的意愿和需求。真实性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系列实践、制度设计、目标体系等都是真实的，不是走过场的，不是一次性的，更不是形式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性”体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在反映人民的意愿和需求，体现在人民共商共治。在保障人民权利的真实性的过程中，不仅有制度的保障，还有法律和物质的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民对我国民主政治的信任，能够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

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管用性体现在其能够真实保障人民权益的实践效果上。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真正产生民主效益的民主，不是形式上的民主，是能够真正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始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民主最终回归于造福于民的本质之中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实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实现了社会的有效治理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提供了真实有效的保障。

（三）数字民主的有效融入，拓展了人民美好生活的实践空间

近年来，数字移动设备的普遍使用和互联网的大范围普及催生了民主的新形式，即数字民主。所谓数字民主，就是民主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有机结合的民主。它是一种不受时间、地点和其他物理条件限制而实行的民主，为实现直接民主提供新的可能性^[15]。它在大数据和算法技术基础上，实现群众诉求与政治回应之间的有机联系。随着数字民主的有效融入，人民能够更加充分、便捷地表达自己意愿，这无疑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空间带来了全新的拓展，拓展了人民参与

建设美好生活的途径和方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如何参与”的问题。

数字民主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民主实践形式。数字民主以信息的便捷性、表达意见的直接性、监督方式的多样性、参与渠道的丰富性等，有效保证了人民群众广泛持续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增加了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建设美好生活的活力。近年来，全国各地产生了“一呼即办”“民生云服务”“数字人大”“向人民云报告”“社会治理网格化+政协云”等诸多数字民主实践的新形式。总的来说，传统民主与数字民主相结合不仅提高了“为人民服务”的效率，还完善了反映民意、建言献策、监督举报等工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为人民创造向往的美好生活提供了有效途径。

数字民主畅通了全方位开放的民主渠道。数字民主利用数字化设施进行更加便捷畅通的多向沟通，增强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交流，不仅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多样、全方位开放的民主实践渠道，而且推动政府工作的公开化、透明化、高效化。

四、结语

从过程上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广泛性和持续性，满足人民建设美好生活、实现自我价值的“多样化”需要；从体系上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能够参与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满足人民“多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范围上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生态等各方面的事业，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最新成果，全方位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优越性。当然，美好生活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新征程上，我们要继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化对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理解与实践，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成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36-337.
- [2] 贾中海，曹向阳.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新形态 [J]. 理论探讨，2022(5)：40-41.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1.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6.
- [5]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6.
- [6] 王冠群，张韶菲. 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成的三维审视 [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9.
- [7] 董伟伟. 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探索与实践道路 [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37.
- [8]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83.
- [9]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21：281.
- [10] 高健. 让人大监督更显“民生底色” [N]. 西江日报，2022-01-10(5).
- [1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4-09-22(2).
- [1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347.
- [13] 习近平：基层民主越健全，社会越和谐 [N]. 人民日报，2006-09-25(10).
- [14] 李笑宇. 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机制与显著优势 [J]. 科学社会主义，2021(5)：122-123.
- [15] 雷晓欢. 当代资本主义民主理念及其批判 [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5)：147.

责任编辑：王天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内在关系

刘 巍

摘 要:新时代,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实践,需要深入理解和科学把握“两个结合”之间的内在关系。从内容范围来讲,“第一个结合”内在地包含“第二个结合”;从内容属性来讲,“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升华与发展;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讲,“两个结合”是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内在关系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重大命题,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学术界通常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称为“第一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称为“第二个结合”。

深入把握理论逻辑,是有效探索实践的前提。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实践,使其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充分发挥“最大法宝”^[2]作用,需要明确“两个结合”之

间的内在关系。

一、“第一个结合”内在地包含“第二个结合”

从内容上看,“第一个结合”中的“中国具体实际”内在包含着中国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可以明确“第一个结合”包含第二个结合。

“第一个结合”是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第一个结合”相比于“第二个结合”具有时间上的先在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由于党内主要领导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时存在局限,导致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第

收稿日期:2024-09-30

作者简介:刘巍,淮阴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社科处副处长,江苏省重点培育智库苏北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政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历史与逻辑研究”(2023SJZDSZ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王明的“左”倾错误，本质上都是一个问题，即未能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与中国当时的“特殊”之间的关系。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3]这一论断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之路正式开启，即从自发到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一个结合”从实践摸索到科学认知并逐渐形成了先进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指导中国革命的道路越走越宽，最终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与发展的实践，同样证明了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不断取得胜利与进步。

主观实际是物化凝结在客观实际之中的。中国具体实际包括客观实际和主观实际两个方面。客观实际主要指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设施、组织与活动。主观实际则主要指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从层次上划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以及按照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划分的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主观实际虽然无形，但可以通过个体和社会阶级或团体的行为与活动得以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开展革命实践时，必然深入考察了当时社会个体及不同阶级、团体的心理、思想、文化观念特质，并根据这些特质提出一系列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纲领、政策与主张。例如，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充分研究了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与主观实际，而其本人所掌握的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内在要求。

认识的基础是实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实践和认识之间，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在认

识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4]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的理论创新不仅在时间上具有先在性，在逻辑上也具有先在性，即“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的形成过程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逻辑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普遍真理，是具体时空下掌握这一真理的人们的认识工具。这一认识工具在与具体个体的理论、思想、思维习惯相互作用时会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从而得出相对具体的结论。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实践的过程，而非纯粹形而上的抽象。“第一个结合”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侧重的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第二个结合”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点是促进两种认识之间的融合与作用，以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为来源、动力、目的和标准。因而“第二个结合”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处于从属与派生地位的。

二、“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升华与发展

如上所述，“中国具体实际”内在包含着“文化实际”。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并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的核心要素呢？理解这一点，是深入理解“两个结合”内在关系的重要前提。“第二个结合”的生成逻辑是什么？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更好地把握“两个结合”的内在联系。

第一，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身属性来看，前者更侧重于客观现实，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实际条件；而后者则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将其单独提出并着重强调，是我国社会发展阶段跃升、发展模式升级的必然结果。2021年，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日益

增长，对文化生活的质量有了更高的期待。因此，文化强国建设被提上了日程，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

第二，从目前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矛盾日益加剧，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普遍攀升，极右翼或极左翼政治力量的影响不断扩大。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加重，包括“俄乌战争”和“中东矛盾”在内的短期激烈冲突甚至局部暴乱时有发生，矛盾升级趋势明显。西方国家面临既不能保持现状、又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出路的困难处境，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于资本和偏重效率的制度性弊端变得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对全球和地区事务的掌控力下降，对全球和地区治理造成更大障碍和破坏，给全球和地区局势造成更多的不稳定性甚至风险。面对内外环境变化，为满足我国人民生活文化需求、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唤醒和创新发展的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必然之选和“必由之路”。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是我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在清末民初，面对西方科技与文化的强烈冲击，我们一直保有“学徒”心态，这种心态就暗含着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破旧立新是发展的必然，否定过去才能迎接未来。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观指出，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一个新旧事物既联系又发展的过程，是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其实质是“扬弃”。从当时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实际情况来看，即使有部分学者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崇拜迷信西方文化的做法仍然是当时社会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主流。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文物和文化遗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时亦是不加区分地对待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以后，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的“思想解放”彻底否定了“文革”中对待传统文化

的过激做法，但尚未上升到重新认知、梳理、挖掘进而创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层面。“两个结合”的提出，是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科学的高度，其中蕴含着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分析、科学定位和辩证评价。

三、“两个结合”是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体现了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作为客观辩证法的“两个结合”具体体现在中国的立国、兴国、富国到强国的四个发展阶段；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法的科学反映，作为主观辩证法的“两个结合”具体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三次飞跃。

作为客观辩证法的“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引，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主流主线，是辩证运动的规律性历史实践。它不包括每个历史细节与微观历史事件，不是客观的个别，而是客观的一般，即走向进步的各个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宏观历史脉络，即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在这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了四件大事：一是开天辟地，即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业；二是改天换地，即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成兴国大业；三是翻天覆地，即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大业；四是惊天动地，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并将在21世纪中叶实现强国大业。这些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历程与历史规律的演进。

作为主观辩证法的“两个结合”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是中国共产党对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真理性认识。主观辩证法采取观念的、逻辑的形式，同人的思维的自觉活动相联系，来

源于客观现实，又是对客观现实的规律抽象。“两个结合”的主观辩证法体现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观进程相对应的理论创新的三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二次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创立和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第三次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新的实际出发，党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在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作为客

观辩证法的“两个结合”将会展现更加丰硕的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成就，作为主观辩证法的“两个结合”将会创造更加灿烂的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成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
- [2]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2023(17)：6.
- [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 [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78.

责任编辑：徐晓婷

人文与经济的“离”与“合”： 基于知识考古学的概念画像

何 雨

摘要:基于知识考古学的研究发现,人文与经济之间长期存在紧张关系,其表现为:人文对经济的钳制或是经济对人文的背离。然而,当特定条件得到满足时,二者的统一和合是可能的。在追求人文与经济的和谐统一方面,东西方文明都有着悠久的传统,也是贯穿于文明发展历程的不变期待。与资本主义固有的体制缺陷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为人文与经济的和合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为准确绘制人文经济学的概念画像,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在与文化经济学的观照中识别人文经济学;二是在知识网络的衔续中理解人文经济学;三是在时代背景的洞察中构建人文经济学。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人文;经济;离与合;知识考古学

一、作为一种研究新图式的知识考古学

知识考古学是米歇尔·福柯创设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考古学的描述正好是对思想史的摒弃,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系统性拒绝,它试图实践一种同人们所言的截然不同的历史。”^[1]考古学,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各种地下遗物遗迹等物质现象的考察,来重新研究古代社会历史。以知识为对象的考古学,显然迥异于一般的考古学范畴,诉诸的不是地下的遗物遗迹,而是人类社会进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关键性概念,

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精神领域。

何谓知识?彼得·伯克给出了相对宽泛的、非严格的定义。“知识”指的是经过一定阶段处理、相对成熟的内容^[2]。准确理解、合理运用这些概念,才能真正阅读、书写、评估人类社会所创造出来的智识成果。对于福柯来说不同寻常的是,其对知识概念的考古学分析,并非为了肯定这些概念,反而“是为了让它们受到怀疑;是打乱它们,然后看看它们是否能合法地重组;是否能建立另一些概念群;是为了在更普遍的空间中取代这些

收稿日期:2024-09-19

作者简介: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专职研究员,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基地特约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到二〇三五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逻辑与战略路径研究”(21ZDA07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旧概念，这个空间驱散了这些概念的表面上的熟悉性，并有可能建立有关概念的某种理论”。^[3]显然，这是一种离经叛道但又立场鲜明的知识旨趣，聚焦于对既有知识的解构，试图走出线性现代主义下的必然性与确定性牢笼，为多元化的人类社会生活提供新的可能的知识视角或范式。基于此，在微观知识考古学实践中，福柯更为青睐那些被忽视的边缘性概念或尚未成熟的知识，如监狱、疯癫、性史等等。

知识考古学为准确理解新知识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法和路径。新知识，往往是刚刚诞生或涌现的，针对的也是新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尚未形成确定的完整的内涵，但这一新知识的生产也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必然深深地嵌入在过去的知识之网中。知识考古学就是要通过对相关概念的源头性追溯、系统性考察，拨开笼罩在新概念上的面纱，厘清其内涵，明确其外延。作为新概念，人文经济学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亟须借助于知识考古学，厘清其流变谱系，才能为之正本清源，绘制出可能的画像。

二、“断舍离”的流变：知识考古学下人文与经济的紧张

人文与经济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迷人的话题，激发起古今中外思想家们的广泛兴趣^[4]。到底是如管仲所说的“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由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决定文明；还是如孔子所称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也”，意识脱离物质，观念决定行动呢？微观个体的选择困境，也是宏观结构紧张的缩影。人文与经济、观念与行为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不仅是复杂的伦理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必须在更为宽广时空视野的观照下，透过历史的长河、超越文明的藩篱，才能形成更为客观公允的全面理解。

（一）作为时代问题的人文与经济的紧张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

学。”这是 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作出的重大判断，既是对苏州、杭州在现代化征程中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文化发达关系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更多城市乃至全国未来现代化图景的美好期冀。这一论断在相当程度上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和关键环节，凸显了苏杭区域实践的价值与示范意义。

提出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发展与文化发达的并驾齐驱、相得益彰，并没有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现象。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失调、失衡几乎无处不在地困扰着中国式现代化。明显的表现就是市场经济对正确义利观的冲击。市场经济往往基于理性人假设、个人主义立场，或功利主义动机，将逐利作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种取向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由于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制约和必要的伦理道德约束，逐利动机可能演变为唯利是图，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例如，在“破坏性建设”的城市现代化口号下，大量的城市历史文化遗存遗迹惨遭破坏，城市文脉与城市魂脉被无情中断。诸如此类的经济利益与人文关怀的背离现象不胜枚举，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

提出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另一原因在于江苏特别是苏州的现代化实践，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1992 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期间停留南京火车站时寄语江苏“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一点”。2003 年全国两会期间，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先后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明确要求江苏“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2020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苏时提出“着力在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在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上争做示范，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始终按照党中央的嘱托和人民的期待，坚定扛起走在现代化前列，为全国发展探路的光荣使命，并高质量高水平完成这一答卷。其

中，苏州作为最为突出的优等生，早在1982年人均GDP就接近800美元，验证了邓小平关于中国式小康社会的愿景。习近平总书记在苏州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看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指出“像昆山这样的地方，包括苏州，现代化应该是一个可以去勾画的目标”。显然，从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苏州乃至江苏一直走在前列，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探路中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而人文与经济的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就是其中最为宝贵的经验。

（二）紧张的两形态：人文对经济的钳制，抑或经济对人文的背离

人文与经济之间的紧张是重大的现实问题，也是由来已久的问题。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视角来看，人文与经济之间总是存在种无形的紧张状态。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从历史视角看，这种紧张更多地体现为人文对经济的钳制，即人文关怀的目标往往需要建立在对经济发展正当性的否定之上；而从现实视角看，这种紧张主要表现为经济对人文的背离，即经济发展作为手段，日益背离了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人文目标。

人文对经济的钳制，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现象。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是西方人文钳制经济的集中表现。期间，人文与经济的冲突被宗教神学刻意制造出来。《圣经·新约》上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财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欧洲长期存在的反犹太主义文化根源。犹太人具有强烈的商业基因，当时主要以放高利贷等行业来营生，与基督教所追求的面向神圣世界的彼岸诉求截然不同。客观上看，这一人文取向下的基督教财富观，钳制了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也为后续宗教改革以调和神圣世界与世俗社会冲突提供了动力。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详细解释了新教伦理如何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从而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学理性的支持。当然，重义轻利

并不是西方特有文化现象，也是东方社会的重要传统。例如，孔子的典型人格就是“子罕言利”，即使有所论述，也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继承并发展这一思想，他高举仁义大旗，直言“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对于“鸡鸣而起”的人进行了区分：“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在孟子看来，那些以盈利为导向，即使勤劳早起，也不过是大盗柳下跖的同类。这种以道德和仁义为重，轻视利益追求的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国古代延续数千年之久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学理基础。

经济对人文的背离，主要是一种现代性产物。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推开了欧洲社会的现代转向，带来了人文与经济关系的翻转，也改变了人们对于世俗经济生活的传统看法。在此之前，人们常以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人文关怀压制世俗经济活动，但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等历史事件的发生，世俗生活和经济利益逐渐上升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首要事务。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商业资本主义在18世纪迎来了新变革，工业资本主义走上了历史前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有过深刻的描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随着理性的增长与精神上的祛魅，人们终于摆脱了中世纪人文对经济的钳制。经济一旦走上历史前台，经济也获得了自我的生命力，开始了自我的大扩张。这一扩张始于经济领域，但随后不断地侵蚀着精神世界。面对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后所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忧心忡忡地作出了“西方的没落”的著名断言，认为西方文化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末路穷途。二战后，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尖锐地指出：“相反，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是十分明确的，现在并非第二轴心期。与轴心时期相比，最明显的是现在正是精神贫乏、人性沦丧，

爱与创造力衰退的下降时期，只有一点仍可与以前的一切比美，那就是科学和技术的产生。”^[6]

（三）紧张的根源：一种可能的社会结构概念图式

为什么传统社会出现人文对经济的钳制，而现代社会又出现经济对人文的背离？人文与经济紧张的实质到底是什么？这是注定无解的难题，还是阶段性困扰？这些问题是理解人文与经济关系时必须回答的。

丹尼尔·贝尔为这些问题的理解提供了可能的概念分析图式。在他看来，政治、经济、文化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三大关键领域，每个领域都有属于自己的运行逻辑。政治领域的运行逻辑在于公平正义，轴心原则为平等；经济领域的运行逻辑在于工具理性，轴心原则为效益；文化领域的运行逻辑在于价值理性，轴心原则为意义。在理想社会中，这三大领域之间是相互补充、彼此协调的，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在于，这三大领域矛盾重重，呈现出严重的结构撕裂。在他看来，韦伯的“禁欲苦行主义”与桑巴特的“贪婪攫取性”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新边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险精神。文化领域内的冲突同样剧烈：一方面是文艺复兴遗产带来的个性解放与自我表现，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价值的顽固保守。此时，本应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赋能的文化价值也失去了往昔的风采，文化“不再与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有关，它关心的是如何花钱，如何享乐。”^[7]资本主义精神失去了韦伯意义上的以天职为取向的宗教冲动力，只剩下桑巴特意义上的经济冲动力。与此同时，本应发挥调节职能的政治领域，也因为科层体制与官僚权威的失能而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

丹尼尔·贝尔的分析图式聚焦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与经济矛盾的分析，也为分析传统社会中的人文与经济矛盾提供了概念框架。无论是东方

还是西方，都面临着人文对经济的钳制与经济对人文的背离的共同问题。这种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经济与文化三大领域遵循的原则与约束条件不同。在传统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无法满足普遍的奢侈性消费需求，因此必须通过文化上的精神生产来补充物质的匮乏。正是在此意义上，无论是西方的以此岸的苦痛换取彼岸的幸福观念，还是东方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都是对社会三大领域发展不足的反映和应对。

三、“统于一”的源头：知识考古学下人文与经济的和合

人文与经济的分离或紧张，既有现实的映照，又有历史的回声。但这种分离或紧张是固有的吗？还是对常态的一种暂时偏离？德国哲学家杜勒鲁奇曾说过：“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上理解事物。”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问题的源头，通过更宽广的历史视角和大尺度空间的跨文明的比较，才可能得到理想的答案。

（一）西方的起源及其演变

西方文明是古希腊文明与古希伯来文明交融的产物。要想从起源上理解人文与经济的关系，就必须回到这两种文明中去，尤其是古希腊文明，这也是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西方文明的源头。

城邦是古希腊特别是雅典的生活方式。作为雅典的执政官，梭伦推动了一场旨在城邦财富与正义再平衡的伟大改革。“我擎巨盾，庇护双方，不使任何一方遭受不义的凌侵。”^[8]在其颁布的“解负令”中，明确要求削减穷人对富人的三分之一债务，试图减轻贫富分化带来的阶级对立对于社会稳定的负面冲击。柏拉图对此表示肯定：“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9]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最好的城邦和美好的生活必须依靠一定物质财富的积累来保证。^[10]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也是“经济”术语的第一个使用者，他认为钱对于不会使用或错误使用它的人来

说，并不是真正的财富。显然，对轴心时代的希腊思想家们来说，人文与经济的分离，或者正义与财富的紧张，已是社会生活中的现实，但这并非人类理想社会的归宿，因此才会有柏拉图的《理想国》。

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礼敬，也是人文与经济和谐共存的时期。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策源地和主要推动者。文学三杰率先拉开了文艺复兴的帷幕，从但丁的《神曲》到彼得拉克的《阿非利加》，再到薄伽丘的《十日谈》，共同开启了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波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中世纪的宗教神学让位于新的“人学”。其中，彼得拉克更是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紧随其后的美术三杰，除了“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人物”达·芬奇之外，还有以体现女性柔情与青春健美形象的圣母画家拉斐尔·桑西，以及代表文艺复兴雕塑艺术最高峰的米开朗基罗·博纳罗蒂。此后，人文主义潮流不仅从文学、艺术领域扩展到天文、地理、生物、物理等领域，而且也从意大利扩展到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学识、精神和性格方面的巨人。这个时代，法国人正确地称之为文艺复兴。”^[1]文艺复兴发现了人和人的伟大，彰显了人的价值和伟力，带来了人的解放，也带来了经济的解放。商业资本主义全面走上历史舞台，并在地理大发现的世界大航海运动中推动了全球霸主的更迭。

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之后世界范围内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为新兴的工业资本主义提供了与之更为契合的人文精神支柱。法国成为运动的中心，理性成为其核心追求。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思想家强烈抨击王权的专制和神权的愚昧，呼唤自由、民主与平等，为包括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在内的新一轮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运动的直接动力来源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崛起，反过来也促

进了正在蓬勃展开的以工业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运动推动了全球霸主地位由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移。具体来说，就是依靠工业革命起家的英国终于超越了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海上马车夫”尼德兰（荷兰），开启了属于“日不落”帝国的高光时刻。

（二）中国的起源及其演变

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中国在人文与经济关系方面有着极厚重的历史底蕴，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具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历史阶段莫过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与古希腊的轴心时代有很多巧合或雷同之处。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此时都处于大争之世，不仅在政治军事上诸侯争霸，知识文化上也出现了思想争鸣。在中国，政治军事争霸经历了春秋时期的诸侯盟主之争与战国时期的天下一统权之争。知识文化上的思想争鸣，表现为流派迭出的百家争鸣。其中共通的争鸣主题，即是治与乱。尽管在成因分析与对策选择上有迥然不同的判断，但共享的基调就是对大争之世混乱不堪的忧虑，希望能够重建秩序，再构社会稳定，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这也构成了人文与经济关系知识生产的思想与情感底色。

一是在人文与经济的关系中坚持民生本位的立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什么样的“本”才能称之为“固”呢？那就是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人民群众，即要“利用，厚生”。所谓“厚生”，就是轻徭薄赋，不夺农时，使得老百姓生计温厚，丰衣足食。这与孔子的观点相呼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即立足民众的利益，满足民众的利益，就能让民众得到实惠，而又不用耗费太多治理者的精力。当民众正当的物质利益得到满足，维系社会稳定的道德伦理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孟子所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反之，如果缺乏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就会人心动荡，社会可能陷入混乱。因此，“使老有所

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得以可能。

二是在人文与经济的关系中坚持轻徭薄赋的政策路径。孔子认为，“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落实到实践路径上就是“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百姓富足，君主自会富足；反之，百姓贫病，君主也会随之贫病。“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显然，富国的根本在于富民，而富民的关键在于不过度征用徭役、劳役，要减轻税负。那么，适度税赋的标准究竟是多少呢？孟子给出了答案：“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要遵循夏商周三代共同的税赋标准，即十取其一，这与井田制下公田占比大体接近。孟子之所以强调要固定税赋，是因为战国时代诸侯们穷兵黩武，对于民力民财的压榨早就超过了什一而税的旧制标准，导致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孟子认为，一旦能够固定源自夏、商、周三代的税赋标准，那么他孜孜以求的仁政愿景也就触手可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三是在人文与经济的关系中坚持勤俭治国的价值取向。“勤俭”蕴含两层意思：“勤”指的是勤劳，“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勤是收入的源泉，决定了社会生产的蛋糕能做多大。“俭”指的是节俭，“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节俭是支出的前提，决定了社会生产的蛋糕能够吃多久。在社会生产力所创造的剩余物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过于奢侈会迅速透支社会财富，带来巨大灾难。为此，高度重视礼制的儒家也充分认识到节俭的重要性，“礼，与其奢也，宁俭。”荀子主张：“足国之道，节用裕民，善藏其余。”道家的节用观体现在《道德经》中：“我恒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之所以以俭为宝，因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

令人行妨”。墨家则是知行合一的节俭典范，针对儒家礼制实践所带来的“厚葬靡财而贫民”与“服伤生而害事”的弊端，发展出“非乐”“薄葬”“节用”等思想，主张“背周道而行夏政”。墨子认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因此，必须“去无用之费”，即统治集团不要把大量的社会财富浪费在“厚葬”和靡靡之音、声色犬马之中。如果能去除这些非必要的费用支出，那么无论是“一国”还是“天下”，都“足以倍之”，社会财富能够实现翻倍增长。

（三）和合之可能：条件论

紧张，来源于分离。告别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后，人类进入了日益分化的阶级社会。这种分化不仅仅体现在社会分工、身份等级上，也体现在人与生产的关系上，并经过漫长的演进转化为人文与经济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人文与经济的分化是社会分化的必然结果，一旦发生分化也就意味着两个部门的产生以及两套逻辑的运行。当人文部门与经济部门的运行逻辑相向而行、彼此交汇，两者之间就会出现较高水平的契合度，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反之，当人文部门与经济部门的运行逻辑相背而行、彼此脱节，两者之间就会出现紧张，背道而驰、各行其是。因此，人文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非注定不变，而是一系列条件的产物。当紧张的条件满足时，就会表现为冲突；当和合的条件满足时，就会表现为协调。

那么，支持紧张或和合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呢？在哪些情况下会出现紧张，又会在哪些条件下出现协调？显然，紧张或和合的首要前提是目标的分歧或一致。当人文关怀与经济发展享有一个共同目标，比如坚持建设具有普惠性的美好社会时，二者就能相向而行、相得益彰。相反，如果人文关怀的目标侧重于民生，而经济发展侧重于资本，那么两者就会背道而驰。其次，妥善处理二者在手段上的差异。人文关怀更多的是一种价值理性，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而经济发展主要是一种工具理性，追求资源利用的效益优先。二者可以相互成就，但如果以否定性的姿态来审

视对方，紧张就会爆发。在此意义上，无论是人文关怀对经济发展的钳制，还是经济发展对人文关怀的反客为主，都因为二者视对方为对手的结果，无法兼容并蓄。再次，要凝聚内容上的共识。人文关怀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没有人文关怀的指引，经济发展就会失去方向，可能出现“异化”现象。经济发展是人文关怀的基础，没有充分的经济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人文关怀，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外思想家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过这一问题。人文与经济关系的两面性，也带来了思想家们洞见上的两面性。例如，儒家既看到人文与经济分离下的紧张现实，也提出了超越现实、重现连接人文与经济的和合理想。

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已经为人文与经济的和合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一个人口规模巨大、国土幅员辽阔的后发追赶式现代化国家提供了人文与经济和谐发展的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确保人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和现代化建设的受益者，为人文与经济和合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和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变了我国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完成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人文与经济的和合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条件、政治前提、制度保障与经济基础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这为避免人文与经济紧张乃至冲突提供了可能。毕竟，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财产私有、贫富分化、劳工异化等问题是结构性的，意味着人文与经济的结构性紧张，注定无法在现有的制度框架里得到根本解决。

四、可能的概念画像：在知识网络中绘制人文经济学

人文与经济和合关系的新可能是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的产物，但关于这一新关系的理论建构仍处于起步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构建人文经济学的概念框架，并积极探索人文与经济和合的可能路径。

一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统摄中定位人文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灵魂与旗帜，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理解人文经济学同样要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对于中国来说，“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概念，尽管在定义上与“经济”概念是并行的，但在地位上却是迥然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政治经济学，是在政治统摄下的经济学，经济要服从服务于政治目标与部署。基于此，只有从政治上理解人文经济学，才能准确理解这一概念本身的价值，才能理解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苏作出的“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不仅有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有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论点的宏大意义，即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来说，人文经济学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是在与文化经济学的观照中识别人文经济学。“文化经济学”是与现代社会科学同步出现并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的学科术语，关注的是文化产品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并运用经济学理论与工具探讨这些文化商品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因此，文化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是特殊的研究领域。与之不同，人文经济学是新术语，它不是经济学的具体领域，也不是旧概念。“新”体现在“人文”不是一个修饰性或从属的概念，而是原则性、方向性前提，对“经济”提出了限制性和规定性的要求。虽然“人文”与“经济”构成了人文经济学的一体两面，但两者的权重并不相同，特别是在当前阶段，“人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需要优先关注的对象。这是因为过去的发展模式过于关注“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人文”

的缺课，强化“人文”的价值性，也是一场补课，补的是经济发展中人文缺失之课。基于此，不仅明晰了人文经济学新颖之所在，也明晰了其重点所在。

三是在知识网络的衔续中理解人文经济学。人文经济学虽然是新提法，但并非孤立，而是深植于既有的知识网络中。这个概念的背后，是对于“人文”与“经济”术语的重组。“人文”与“经济”都不是新概念，早就嵌入于古今中外的知识网络和学术传统中。经济学是外来术语，源自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但“经济学”到“经济”的转变却带有深刻的中国特色。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知识体系中，“经济”的意涵是经世济民。从经世济民的角度理解“经济”，就走出了西方经济学个体理性下的利益最大化牢笼，展现出更为宽广的家国情怀和人文精神。“经济”之意图，就是要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谋幸福。一旦把概念的内涵上升到这一高度，就可以发现，“经济”就近乎完美地实现了与“人文”的和合。“人文”在《易·贲卦·象辞》中的解释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在与“天文”的对照中得以确立自身的边界，即人文是指向“人”的，目标是让人脱离野蛮，拥抱文明，而文明的意义则在于“化成天下”，也就是通过教化达致天下太平。在此意义上，把“人文”与“经济”衔续起来，就会发现人文经济学的意义，它绝不是一时一地之学，而是化成天下之学，具有鲜明的世界意义。

四是在时代背景的洞察中构建人文经济学。时代之所需，是人文经济学形成的根本原因。当前，全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全球看，帝国霸权下文明冲突日益增多、剧烈，严重阻碍文明交流与互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带来经济全球化的大倒退；同时，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全面重塑全球生产关系与生活

方式，但科技伦理的滞后或缺失，使得科技驱动下的经济如同脱缰野马，让人类社会面临不确定和不可控的风险。从国内看，在双循环大格局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加速，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正在驱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然而，在这一剧变的过程中，“强经济”与“弱人文”的失衡日益显现，如何借助于“人文”精神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培根铸魂，依然任重道远，依然亟须人文经济学给出自己的答案。

参考文献：

- [1][3]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138、26.
- [2] 路雅鑫. 打破学科界限的知识史——评介彼得·伯克《什么是知识史》[J]. 中国图书评论, 2014(1): 87-97.
- [4] 何雨. 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和合共生何以可能? ——以江苏为例[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 42-51.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36.
- [6] 雅斯贝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 魏楚雄, 俞新天,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112.
- [7] 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赵一凡, 蒲隆, 任晓晋,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117.
- [8] 亚里士多德. 雅典政制[M]. 冯金朋,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43.
- [9] 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135.
- [10] 高广旭. 古典政治哲学与《资本论》的当代激活[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 1-10.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九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405.

责任编辑：蒋建忠

爱国企业家精神融入高校“大思政”的 意蕴、现状与路径探索

陈晓峰

摘要:近现代爱国企业家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力量和育人价值。通过广泛的调研和深入的考察,本文提出了将这一精神融入高校“大思政”育人格局的实施路径。一是坚持“守正”与“创新”相融合,以课堂教学为渠道扩大教育覆盖面;二是坚持“隐性”与“显性”相融合,以校园文化为载体增强教育穿透力;三是坚持“线上”与“线下”相融合,以新兴媒体运用为契机提升学生参与度;四是坚持“践行”与“明理”相融合,以社会实践为手段提高教育实效性。

关键词:爱国企业家精神;大思政;实施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1]近现代爱国企业家精神内涵丰富、特质鲜明,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大思政”不仅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想状态,也是新时代应有的教育担当。将爱国企业家精神融入高校“大思政”,在理念、思路、资源、载体、阵地、路径、方法、氛围等方面守正创新和积极探索。这样的创新不仅能够丰富“大思政”课程理论,还能在实践中激发爱国主义教育的强

大活力。

一、爱国企业家精神融入高校“大思政”的意蕴

回顾张謇等爱国企业家的人生历程、事业成就、重要贡献和社会评价,他们具有真挚的爱国情怀、成功的商业实践、顽强的奋斗品质、强烈的创新意识、坚定的诚信品质、积极的社会担当、开放的国际视野和淳朴的节俭美德。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力量。对于大学生而言,这些品质不仅能够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提升道德修养,塑造

收稿日期:2024-08-23

作者简介:陈晓峰,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思政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现代爱国企业家精神与高校‘大思政’育人格局融入研究”(21VVSZ0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个性品质，还能促进职业素养的发展，饱含育人价值。

（一）爱国企业家精神融入高校“大思政”的重要性

从政治站位看，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的务实之举。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通博物苑考察时强调：“要把南通博物苑和张謇故居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都讲到嘉庚精神，提出要弘扬爱国主义传统。高校应以爱国企业家精神为内容，教育和引导大学生不忘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从使命担当看，这是健全高校“大思政”育人格局的重要之举。为建立健全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大思政”育人格局，高校需要树牢“课程思政”理念，充分发挥每门课程的育人功能，确保每位教师都能扛起育人职责。将爱国企业家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创新思路、丰富载体、拓展实施路径，并完善评价保障机制，健全完善“大思政”育人格局。从发展愿景看，这是教育引导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有效之举。在校大学生未来会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其中一部分人将成为企业家。这就需要立足现在、着眼未来，加强爱国企业家精神教育。教师应强化爱国、担当、诚信、奉献的主流价值观的引领，积极培养学生在新时代经济舞台上展现风采。

（二）爱国企业家精神融入高校“大思政”的可行性

一是弘扬爱国企业家精神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相一致。爱国企业家精神的弘扬旨在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感，培养他们担当作为的品质，以及坚定履行社会责任的价值观。这有助于塑造大学生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引导他们成长为党的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简而言之，弘扬爱国企业家精神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都旨在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将个人的发展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

二是爱国企业家精神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相吻合。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无论是为了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部署，还是为了推动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加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都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开展爱国企业家精神教育有助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创业观念，学会规划职业生涯，激发创新创业的热情，提升创新创业的勇气。三是爱国企业家精神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路径相融通。弘扬爱国企业家精神不仅需要讲述像张謇这样的爱国企业家的奋斗历程和主要贡献，还需要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将爱国情感和报国志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教师应遵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灵活运用课堂教学、专题报告、参观考察、阅读书籍、讨论交流、氛围营造等多种方式，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二、当前爱国企业家精神融入高校“大思政”的现状

笔者设计了一份包含 25 个问题的调查问卷，其中有 20 个单选题和 5 个多选题。问卷内容涉及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对爱国企业家精神的认知情况以及其所在学校开展爱国企业家精神教育的基本情况。调查对象包括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12 所高校的 2116 名大学生，其中男生 693 名，女生 1423 名，这些高校分布在 7 个省（市），确保了调查对象的代表性和广泛性。

统计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认识到高校开展爱国企业家精神教育的重要性，其中 98.68% 的受访者认为爱国企业家精神对国家民族“非常重要”，95.85% 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有必要接受爱国企业家精神教育。然而，大学生们对爱国企业家的了解程度并不深入，知晓面较窄。例如，对张謇等爱国企业家的了解总体偏少，介于 7.94%—56.62% 之间，知晓度介于 38.04%—55.15% 之间。在校园实践中，爱国企业家精神教

育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在班会、团会等场合,只有27.69%的受访者表示经常听到关于近代爱国企业家事迹的宣讲,而58.70%的受访者表示偶尔听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等人文社科类课堂上,42.11%的受访者表示经常听到,53.88%的受访者表示偶尔听到;在非人文社科类课程中,30.29%的受访者表示经常听到,60.11%的受访者表示偶尔听到。由此可见,教师还没有深刻认识到爱国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并主动地将其融入教学实践中。值得一提的是,问卷调查中问及“高校开展近现代爱国企业家精神学习教育,您喜欢哪些方式”时,1705人选择“观看影视剧”,占比高达80.58%。因此,探索开展爱国企业家精神教育,要适应大学生的认知需要和心理特点,这样有助于提高教育成效。

三、爱国企业家精神融入高校“大思政”的路径探索

笔者通过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查阅资料、个别访谈等方式,深入考察南通大学、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等35所高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些高校充分利用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的教育资源,探索开展爱国企业家精神教育,打造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大思政”育人格局。

(一)坚持“守正”与“创新”相融合,以课堂教学为渠道扩大教育覆盖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为此,坚持“守正”与“创新”相融合,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校本课程开发与“课程思政”设计协调推进、互为补充,各渠道各环节共同作用,多元参与主体,形成教育合力。

一是因时制宜讲授思政课,融入企业家精神。

高校教师在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时,要从教材出发,拓展教育内容,适时地讲述爱国企业家的事迹和成就,巧妙地融入爱国企业家精神教育。例如,在教授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这个章节时,教师可以结合卢作孚、荣毅仁、王光英等企业家带头实行公私合营的事迹来向大学生们传递榜样的力量。这样的教学方式可以让思政课堂更加生动,并有效地进行价值引导。

二是结合实际开发校本课程,凸显企业家精神。校本课程的开发主要依据国家教育方针、国家或地方课程计划、学校教育计划、学生需求评估以及学校课程资源,强调以学校为主体和基地,充分尊重和满足学校师生的独特性和差异性,特别是使学生在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中难以满足的那部分发展需要得到更好的满足^[4]。高校可以组织专家学者以爱国企业家为重点,充分吸收当地爱国企业家精神的教育资源,开发爱国企业家精神教育校本课程,以满足大学生成长需求和内心期待。

(二)坚持“隐性”与“显性”相融合,以校园文化为载体增强教育穿透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5]校园文化是隐性教育载体,与思想政治教育互通、互融、互动,对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具有潜在的教育作用。高校应将爱国企业家精神与学术探讨、文艺演出、读书讲座、环境布置等有机结合,让企业家精神所蕴含的价值观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在学术研讨中提升层次,增强企业家精神教育说服力。学术活动是高校教育文化的主要形式,直接反映了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氛围。高校可以成立专门的社团组织,如企业家精神研究会、企业家精神宣讲团等,定期组织开展学术探讨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教育引导大学生从自

身视角出发,深化对企业家精神的思想认同,深刻体会其价值内涵。高校将企业家精神作为研究重点,着力发挥学术研究的理论优势,深化师生对企业家精神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从而增强企业家精神教育的说服力。

二是在文艺活动中产生共鸣,增强企业家精神教育感染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6]高校可以将爱国企业家精神融入歌舞、小品、情景剧、话剧等文艺演出活动,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使他们能够收获情感共鸣,培育爱国情怀。大学生在文艺作品创作、表演中生动诠释企业家精神,在文艺作品观看、欣赏中深刻领悟企业家精神,实现课堂理论教学与文艺活动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三是在读书讲座中丰富体验,增强企业家精神教育吸引力。坚持以文育人,提倡读书育人。高校可以利用世界读书日、校园读书节等契机,向大学生推荐企业家人物传记类书籍,并组织开展读书交流会、专题讲座、报告会等活动,以此丰富大学生的感性认识 and 情感体验。除了阅读书籍和举办讲座,还可以采用征文演讲、知识竞赛、朗诵等多种活动形式来开展爱国企业家精神教育。

四是在环境布置中营造氛围,增强企业家精神教育影响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7]高校通过校报校刊、橱窗板报、图文展览等,大力宣传爱国企业家先进事迹,营造弘扬爱国企业家精神的浓厚氛围。例如,厦门大学的嘉庚建筑、集美大学长达300米的陈嘉庚语录碑廊等,这些建筑不仅成为校园中靓丽的风景线,也让大学生受到爱国企业家精神的熏陶、感染和浸润。

(三)坚持“线上”与“线下”相融合,以新兴媒体运用为契机提升学生参与度

新兴媒体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和人际交

往不可或缺的工具。高校通过音乐、动画、漫画等大学生乐于接受的网络信息形式,将“高大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传播延伸至网络平台,满足新时代大学生的认知、心理需求,着力破解“网生代”青年学生与主流意识形态疏离这个难题。

一是注重关联性,链接现成资源。围绕弘扬爱国企业家精神这个主题,高校教师要时刻关注、敏锐发现并充分利用网络上现有的以及新增的企业家精神教育资源,可以在校园网站网页设置专题链接方便大学生学习浏览。

二是注重趣味性,开播网络课程。校园网站网页可以开播专题网络课程,供大学生及社会访客观看。精心制作以爱国企业家精神为主题的网络课程,以图片、动漫、短视频、微电影、表情包等形式增加趣味性、吸引力,丰富网络育人载体。例如,南通大学开设的网络课程《张謇的传奇人生》以及集美大学的慕课《陈嘉庚精神》等,受到大学生的广泛好评。

三是注重互动性,用好微信微博。开展爱国企业家精神教育,可在高校公众号、高校共青团公众号、学生工作公众号、思政课公众号中植入短视频、微课程,吸引大学生观看,切实提高参与度。通过内容设计和实践操作,将分属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实体媒介进行融合,使其功能、手段、价值得以全面提升,实现单一媒体到多媒体,平面传播到立体传播的传播转变^[8]。高校能够运用“融媒体”的传播优势,革新和优化媒体传播路径,促进爱国企业家精神教育深入人心,激发大学生爱国情、报国情。

(四)坚持“践行”与“明理”相融合,以社会实践为手段提高教育实效性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指出,实践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对于大学生来说,实践活动应该与感性认识紧密结合,通过实践活动来丰富感性认识,并通过感性认识来指导实践活动,形成一个互相映射和互动的过程,从而促进思想观念的变

革和创新。将爱国企业家精神教育融入社会实践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如参观考察、实践调研、志愿服务和创业教育等。

一是把握参观考察的“角度”,企业家精神教育沉浸式体验与自主性参与同向。参观考察的形式给大学生带来的视觉、思想冲击,远比“课堂+书本”更为直接深刻。在爱国企业家精神的实践教学活动中,大学生通过参观考察获取大量的信息,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发展和内蕴。按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要求,高校可以充分挖掘教育资源,由校内延伸校外,精准开发教学专题,有计划地组织大学生参观纪念馆、故居等场馆。大学生通过自主式参与、沉浸式体验,才能更透彻地理解爱国企业家精神,强化对企业家精神的认知和理解,并将其内化为自身价值观。

二是把握实践调研的“深度”,传承企业家精神与观照现实问题同构。高校可以组织大学生走出校园,参加调研活动,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组织大学生走访爱国企业家的后人,通过深度访谈获取原始资料,丰富他们的感性认识,使他们深切感受到爱国企业家精神。同时,高校还可以组织大学生积极申报创新项目,鼓励他们深入企业了解商业模式的创新实践,并由专人指导大学生撰写调研报告和学术论文。

三是把握志愿服务的“热度”,坚持内化于心与外化于行同频。大学生志愿者是我国青年志愿者的主力军,高校应当鼓励大学生参加企业家精神宣讲、展馆义务讲解等志愿服务工作,以此来传播企业家精神,强化价值引领。例如,厦门大学创建了“嘉梦海扬”志愿服务团,而集美大学则成立了“诚毅精神践行社”,这些团体都成为嘉庚文化的传播者与践行者。在爱国企业家精神的宣传和实践活动中,志愿服务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参与、表达和传承的平台,促进了教育模式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转向更加注重参与和体验的学习

方式的转变。

四是把握创业教育的“精度”,企业家精神教育内容的时代性与历史性同在。作为培养未来优秀企业家的重要路径,高校应当把企业家精神融入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中,以组织“挑战杯”“创业大赛”等课外科技竞赛活动为抓手,开展市场调研、企业实习、社会勤工俭学、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等活动,培养当今大学生的企业家精神,提升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同时,高校开展的创业教育,应当发挥企业家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引领作用,营造出尊重企业家、热心创业创新的浓厚氛围。

大学生思想品德的每一个要素,都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强化和巩固的^[9]。社会实践育人是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教育、提高大学生实践能力、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因此,高校需要聚焦大学生的成长成才,遵循“知、情、信、意、行”统一的原则,开展参观考察、实践调研、志愿服务和创业教育等活动,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地进行实践创新,打造社会实践协同育人共同体,让爱国企业家精神真正渗透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之中。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21.
- [2] 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强调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N]. 人民日报, 2020-11-15(1).
-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78.
- [4] 王伟. 校本课程开发的理念与实践[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 6.
- [5]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6-12-09(1).

- [6]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12-01(2).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92.
- [8] 杨武成, 姚海田, 于露, 等. 融媒体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应对策略 [J]. 高教学刊, 2016(20): 233-235.
- [9] 张耀灿.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92.

责任编辑: 徐晓婷